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計 畫 類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NSC 101-2410-H-004-155-
執 行 期 間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林果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欣樺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郁婷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芷盈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在 1950 年代頻繁的宣傳命令與黨政媒體中所呈現的國際樣貌，究竟由哪些人塑造執行？而這些任職於黨政宣傳機構的人員，他們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在不同時期是否有所變化？彼此之間的異同為何？對宣傳命令或媒體的呈現是否產生任何影響？簡單而言，「人」的因素在 1950 年代國際觀的塑造上究竟佔了什麼地位？本計畫選擇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四位宣傳人員的代表性人員，藉由他們擔任黨營媒體主管以及實際執行國際觀塑造的經歷，透過他們國際情勢分析的豐富著作，從擅長議題的不同、言論尺度的拿捏與不同時期的變化等面向，希望能推演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國際觀的特色與個人風格。並進一步之前計畫成果的基礎上，與《宣傳週報》中的宣傳命令比對，觀察不同的宣傳人員與宣傳命令之間是否有差異、在哪些地方有差異，此差異與個人的學養經歷有何關係等等，如此或可更進一步掌握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

研究發現，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部分差距。曾虛白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阮毅成離開《中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這些宣傳人員在位置上忠誠傳達黨意，並未寫出與黨意違背的文字，意味著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統治，特別是國際觀方面的表述已建上軌道。藉由考察宣傳人員的個別經歷與學識，在個人較為擅長的議題上，就可看出立論的切入點及所運用資訊的差異。此研究發現對於未來更進一步深入掌握其他宣傳人員的國際觀，具有基礎性的貢獻。

中文關鍵詞： 宣傳人員、國民黨、國際觀

英 文 摘 要 ： What this project wants to ask is: who is the propaganda staff to build the world view in 1950s Taiwan? What kind of the world view does the staff have? Is there any change about the world view? What are the same or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world view? And is there any change about the

representata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world view of propaganda staff? To put it simply, what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 of ’ person’ in building the world view in 1950s Taiwan? This project selects four important propaganda staff, who is Syu Bai Ceng, Si Sheng Tao Yi, Cheng Ruan and Shih Ying Li to be the research object. They are the chief of KMT’ s media enterprise and spread the world view by a large number of writing. By the different topics and critical judgement of their writing, this project wants to fi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personal style of the world view of the propaganda staff. This project will also compare the world view of the propaganda staff with the propaganda order of Propaganda Week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view and the propaganda order,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paganda staff, and to know the influence of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英文關鍵詞： Propaganda stuff, KMT, world view

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The World View of KMT’s Propaganda Staff in 1950s:

Focus on Syu Bai Ceng, Si Sheng Tao Yi, Cheng Ruan and Shih Ying Li

目　次

一、　前言 1
二、　研究目的 1
三、　文獻探討 2
四、　研究方法 8
五、　研究成果 9
六、　參考文獻 10
七、　計畫成果自評 11
八、　附件：研究發表文章 13

一、前言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在1950年代頻繁的宣傳命令與黨政媒體中所呈現的國際樣貌，究竟由哪些人塑造執行？而這些任職於黨政宣傳機構的人員，他們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在不同時期是否有所變化？彼此之間的異同為何？對宣傳命令或媒體的呈現是否產生任何影響？簡單而言，「人」的因素在1950年代國際觀的塑造上究竟佔了什麼地位？

本計畫源起於之前所核定的兩個計畫，亦即「一九五〇年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NSC99-2410-H-004-084)，以及「1950 年代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國際觀：以《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為中心(1949-1960)」(NSC100-2410-H-004-136)(執行中)。前者從當時國民黨第四組的機關刊物《宣傳週報》，獲得數量龐大而鉅細靡遺的國際情勢分析，藉以觀察齊一宣傳口徑、下達到各級宣傳單位的宣傳命令。後者則以此為基礎，從實際的媒體呈現，對照政策與執行的差距，並比較官方立場和民間的差別，特別著重在兩者交鋒應對的狀況。然而，隨著研究的進行，有個最基本的問題逐步浮現：在宣傳命令和國際情勢評論的背後，到底是由哪些人擔當執行？這些人在特定時期、特定議題與特定位置中，是否發揮了特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自己所抱持的國際觀又是什麼？這些人在分析國際局勢時，必須在自己的知識觀點和宣傳立場之間審酌拿捏，不同的學養經歷與內外情勢，使得他們所表述的國際觀不太可能全部相同。唯有回歸具體的個人，考察他們對國際局勢的表述，才能理解這群宣傳人員如何展現個人特色，將原則性的指示命令轉化為一般人接觸得到、容易理解的各式資訊。本計畫的背景，就是在前兩年計畫的基礎上發想，亦即在鉛字印刷的宣傳命令和報紙專欄的背後，試圖尋覓動腦執筆的人以及他們的想法，以進一步拼湊 1950 年代台灣人國際觀如何被形塑的過程。

二、研究目的

然而，誠如計畫的審查委員指出，本計畫可能隱含些許問題。例如，本計畫雖欲討論一群職掌領域相同人員的個人想法，但在相關會議記錄(如國民黨第四組的會議記錄)及內部資料(如《中央日報》內部工作資料)尚未開放或闕如的情況下，恐怕很難拼湊具體的細節，如此一來，「人」的特定作用似乎很難被凸顯出來。確實，現有資料上的限制，使得目前難以進行政策的討論決定過程，也無法得知媒體內部的編審流程，但是，欲了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其實另有其他文本可供突破。筆者認為，藉由這些人公開發表的國際情勢文章，佐以個人所書寫的日記或回憶錄，反而能更完整而有系統地理解他們的國際觀，並有助於在機構的正式記錄之外，理解這些人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表達。當然，並非每位宣傳人員都留下質量俱佳的資料可供追尋，聚焦於具代表性又可供分析的宣傳人員，成為本計畫所採行的方法。詳細的史料評估與人物選擇標準容後再述，但此處所欲表達的是，原先所可能認為的史料限制，毋

寧應該認為利用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特性，將有助於釐清個別宣傳人員國際觀的特色與變化。簡單而言，在既有的史料基礎上，而非期待尚未開放的檔案，追尋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正是本計畫最重要的目的。

本計畫的重要性源自於這群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一直未有系統性的考察。過去對這問題的忽視，可能來自於假定每個宣傳人員都如同機械般，皆能完整、適切且整齊畫一地傳達宣傳命令，沒有誤差，也沒有個性。證諸史料，蔣介石對《中央日報》嘖有煩言，甚至因社論而對該報社長多所斥指，[1]就算是同一人士，不同時期主持宣傳言論的力度也會有所不同。[2]從過去兩年所執行的計畫中可以發現，理想與實際、政策和執行之間本非理所當然，1950年代是一個黨政方面逐步掌握媒體宣傳的年代，這個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因而在過去的基礎上，本計畫繼續以1950年代為中心，嘗試在「高層命令」與「底下執行」中尋求背後的「個人特性」，觀察宣傳人員在執行命令時的個別落差與特色，而非預設在高層的一聲令下全部整齊畫一，如此或許才能更加掌握國際觀形成的動態過程，以彌補過去學界在此方面較缺乏的討論，此即本計畫的重要性所在。

最後，如題目所示，本計畫將聚焦於四位宣傳人員，亦即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會選擇這四位作為觀察的重點，主要是他們在 1950 年代均曾擔任黨政宣傳部門的重要主管，特別是四位皆在黨營媒體中長期負責並執行言論的傳播，對於國際觀的塑造擁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可視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代表性人物。而相較於其他可能的人選，這幾位的資料則相對豐富。

三、 文獻探討

過去對於 1950 年代臺灣人國際觀塑造的主題，並無直接的研究成果。針對黨政宣傳人員個別的國際觀，比較其彼此的異同，或是對宣傳言論所造成的影響，目前亦為之闕如。不過，與本計畫相關並可援引為參考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於黨政宣傳人員的相關記述。

有關黨政宣傳人員的研究，僅有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一文，是最直接且全面性剖析黨政宣傳機構的學術性成果。該文利用大量的國民黨一手史料，描述 1950 年代宣傳決策核心的機制與變化，並涉及宣傳體系與媒體的互動，是目前呈現戰後臺灣黨政宣傳體系最為具體清楚的研究，為本計畫提供詳實的背景性知識和運作實例。[3]

---

[1] 蔣介石於改造委員會會議中多次表達對《中央日報》的不滿，認為其「屢次發生錯誤，未能立刻糾正」、「編輯及主筆比在大陸上還差」，《中央日報》亦曾因刊登文章不妥而被警告。陳訓悆在任《中央日報》社長時社論常受蔣指責。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51、166。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61-62、73；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12。

[2] 根據曹聖芬的回憶，在他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時，曾被總統蔣介石找去詢問報務，並說「我覺得現在中央日報的社論，不如你主持中華日報時代的有力了。」見曹聖芬，〈服務中央日報的回憶〉，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1988)，頁54。

[3]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頁221-262。

然而，有關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位宣傳人員，幾乎沒有專門性的學術研究。在曾虛白的部分，馬之驌的《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整理了曾虛白在新聞工作方面的事蹟，提供其自傳以外可供查考的例證。[4]其餘如陳新萌、董淑賢和姚儀敏的文章，[5]以及文化大學三民所博士班所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6]不是年譜、訪談，就是其他人對曾虛白的簡單記述，僅能對他有稍多的側面了解。周安儀與鄭貞銘對曾虛白的描寫，提供部分資訊。[7]鄭貞銘另編有《老兵記往》，一半是選錄曾虛白的數篇文章，一半則是徵集慶祝曾虛白八十大壽的紀念性文字，亦屬背景性資訊。[8]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一文提供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曾虛白日記》訊息，有助於理解他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任內的事宜，不過由於該日記所錄時間為 1941 年至 1944 年，與本計畫設定的年代並不相同。[9]

有關陶希聖的論著不少，幾部傳記著作所涉時間多以 1949 年來台之前的事蹟為主，對於在台灣的所思所為甚少觸及，如李楊、范泓的《重說陶希聖》、[10]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11]或是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相關著作[12]。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則是少數論及陶希聖來台後，從事宣傳工作的內部細節。[13]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資料更少，有關阮毅成的著作，多是對阮氏出版書籍的讀後感，[14]而鄭貞銘與周安儀在有關新聞從業人員的書籍中，雖有專章撰寫阮毅成，但僅有簡要的生平與工作介紹。[15]李士英則幾乎沒有人對他有所著墨。

整體而言，目前黨政宣傳人員的研究成果，在背景知識上具有參考價值，但關於他們的

---

[4] 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1986)。

[5]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期(台北，1984.4)，頁15-49；董淑賢，〈曾虛白(1895-1994)〉，《傳記文學》，64:3(1994.3)，頁131-132；姚儀敏，〈人情練達皆文章——訪曾虛白談文藝與新聞事業生涯〉，《中央月刊》，25:6(台北，1992.6)，頁118-123。

[6]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1984)。

[7] 鄭貞銘，〈曾虛白：全方位的新聞人〉，《百年報人1：報業開路先鋒》(台北：遠流，2001)，頁241-256；周安儀，〈辦報、教書、談天下事——獻身新聞事業四十餘年的虛白老人談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5-62。

[8] 鄭貞銘(編)，《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9] 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傳記文學》，83:2(台北，2003.8)，頁87-104。

[10] 李楊、范泓，《重說陶希聖》(台北：威秀資訊，2008)。此書另有簡體字版本，李楊、范泓，《參政不知政：大時代中的陶希聖》(武漢：湖北人民，2009)。

[11]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台北：成文，2001)。

[12] 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北京：中國青年，2008)。該書有部分文章以陶希聖為主題。另外尚有沈寧，《百世門風：歷史變革中的沈、陶家族》(北京：中國青年，2006)；沈寧，《刀口上的家族》(北京：新星，2008)。前者只稍微提及陶希聖，後者則是以陶希聖為主角的小說式書寫，但都只著重1949年之前。

[13] 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傳記文學》，95:4(台北，2009.10)，頁87-92。

[14] 如趙友培，〈清才雅識一書生——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阮毅成著)書後〉，《東方雜誌》，13:2(台北，1979.8)， 頁77-78；林紀東，〈阮毅成先生著「法語」讀後記〉，《東方雜誌》，14:10(台北，1981.4)，頁60-61。

[15] 鄭貞銘，〈阮毅成：書中自有千秋筆〉，《百年報人2：跨世紀的報人》(台北：遠流，2001)，頁93-101；周安儀，〈退而不休的新聞學人阮毅成〉，《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頁401-413。

國際觀則尚無研究。

史料特性

如上所述，本計畫將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及李士英為考察的中心。不過在陳述這四人的資料狀況前，有必要扼要介紹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定義與基本範圍，才能知道是在什麼脈絡下選擇這四人。

簡單而言，此處所謂的黨政宣傳人員，是指在當時的黨政部門中，負責宣傳決策、執行與業務單位的主管人士。本計畫構想之初，鎖定幾個職位作為調查的根本，亦即被認為是宣傳決策核心的宣傳指導小組、宣傳業務小組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16]負責宣傳業務的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與副主任(包括改造委員會與第七、第八屆中央委員會)，[17]以及在傳達黨意時最具代表性的黨營報刊《中央日報》的社長與總主筆，和中央通訊社社長等。[18]其他可視為宣傳人員範圍的當然還有，但這些職位，涵蓋宣傳的決策、執行與媒體業務單位的主管或重要位置，應可稍微勾勒出主要宣傳機構的大概。在這些名單中可以發現，以第四組的人員為核心，大致相同的一批人或流動於不同的宣傳單位，或同時身兼數職，比較符合本計畫所設想的黨政宣傳人員。在這當中，有四個人的影響力足以作為本計畫考察的對象。

首先是曾虛白(1895-1994)，長期在國際觀塑造的重要位置上操刀發聲，為本計畫選擇他的重要原因。曾氏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參與創辦天津《庸報》、上海《大晚報》，1937年擔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38年調任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37年轉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50年代初期，曾氏身兼數個重要的宣傳職位，不僅是中央改造委員兼第四組的主任(1950.8-1950.10)，同時是中央通訊社社長(1950-1964)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1949-1954)，也是宣傳會談的成員(1950)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1957-1963)，長年任

---

[16] 據任育德的界定，國民黨的宣傳決策核心包括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1957年成立)及兩個前身機關宣傳業務小組(1951年成立)、 宣傳指導小組(1954年成立)，加上對外執行業務的中央(改造)第四組工作指導委員會。宣傳業務小組成員有王世杰、黃少谷、張道藩、蔣經國、沈昌煥、朱虛白、郭澄、陶希聖；宣傳指導小組由黃少谷擔任主席，之後即改組為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立初期的主任委員為黃少谷，委員有陳雪屏、張道藩、黃少谷、陶希聖、蔣經國、張其昀、鄭介民、鄭彥棻、馬星野、上官業佑、陳建中、崔書琴、葉公超、沈錡、蔣堅忍、周宏濤、鄧傳楷、羅家倫、沈昌煥、胡健中、謝然之、曾虛白、曹聖芬、魏景蒙、蕭自誠、陳紀瀅、李士英、王民。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291；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台北，2009.11)，頁222-234。

[17] 第四組職權為掌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理論之闡揚，以及文化運動之策劃。改造委員會到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的主任為曾虛白、陶希聖、蕭自誠、沈昌煥、馬星野、沈錡、曹聖芬與謝然之，副主任為蔣君章、李士英、許聞淵、任覺五、沈錡、秦孝儀、楚崧秋與曹聖芬。見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4、266、268、282-283、291、300-301。

[18] 1950年代《中央日報》社長為馬星野、蕭自誠、胡健中、陳訓念、阮毅成與胡健中(再任)，總主筆有李士英、陳訓念。另外擔任過副社長的有蕭自誠、曹聖芬、唐際清，董事長則為董顯光、胡健中與陶希聖。另1950年9月曾虛白繼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一直在任至1964年為止。見上宮美博(輯)，〈六十年大事記〉，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250-253；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1984)，頁330-334。

職於不同的宣傳機構。[19]在他的經歷中，最特別的是他曾擔任中廣聯播節目「談天下事」的主持人，自己撰寫稿件、自己播報，長達二十年藉由廣播講述國際情勢。[20]聯播節目意味著在原本就是稀少資源的廣播頻道，以行政指導的力量，強制所有電台播放統一的內容，因而曾虛白的「談天下事」，是個被黨政宣傳部門認為全民都應知曉的節目，由此可見該節目的位階。曾虛白利用他身兼數職的豐沛資源，由中央通訊社取得國內外重要新聞，聞知黨政高層的意向，以此撰寫廣播稿，直接影響到他分析國際情勢的廣度與深度。[21]這批廣播稿由曾氏集結出版，名為《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以該稿每週一次的頻率與長期持續的特性，正可觀察曾虛白在整個1950年代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與演變。[22]他的兩本文章選集《世變建言》與《曾虛白自選集》收有他在其他報刊發表的國際情勢文章，亦可做為參考。[23]另外，他自撰的三冊《曾虛白自傳》，裡頭詳述在擔任不同宣傳職位時的工作內容重點，以及與他人合作協調的內幕故事，有助於理解他對宣傳工作的看法與內部運作。[24]

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三位黨政宣傳人員，均擔任過最能傳達黨中央意志，同時也深受高層重視的《中央日報》總主筆，其中兩位為第四組主管(陶、李)。總主筆的任務在於負責報紙言論(社論)的成敗得失，須修改其他主筆文字，有時由自己撰寫社論，因此三位宣傳人員在國際觀的塑造上，亦可說負責實際的把關與執行工作。陶希聖(1899-1988) 除了是著名的史學家外，亦是蔣介石的重要文膽，抗戰後開始在宣傳事務中佔有特殊位置。陶氏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抗戰時期進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負責研究與寫作，協助蔣介石起草文稿；1943年起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抗戰勝利後接中宣部副部長，仍兼《中央日報》總主筆，在此期間，多次替蔣擬定重要文告。[25]1950年代歷任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1952年因傷辭去總講座及《中央日報》總主筆，同年由蔣提名為中常委，並於1957年至1963年亦擔任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26]以其深受高層信賴和在宣傳事務方面的嫻熟，由其所起草或審訂的文稿，在國民黨內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其來台後擔任總主筆時的社論或可用「陶希聖時期」來理解(1949.3-1952.3)，當可彰顯他對此報言論的影響。[27]

---

[19] 曾虛白，〈小傳〉，《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2。

[20] 據曾虛白自述，從1950年9月至1970年9月，每星期六晚上七點自撰自播「談天下事」時事評論節目。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1990)，頁493-494。

[21]

[22]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曾虛白，《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23] 曾虛白，《世變建言》(台北：三民，1969)；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

[24]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中、下集)。

[25] 包括1949年總統元旦文告、〈為南京撤守告全國軍民書〉以及黨改造之文稿，多由陶希聖所執筆。見陶希聖，《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印，1978)，頁9-46。

[26] 陶希聖，《八十自序》，頁51-52。

[27] 若從《中央日報》總社的歷史來看，陶希聖時期或應自1943年11月15日其開始任總主筆算起，但陶希聖來台的

社論自然是代表報紙的立場，而非私人意見可以暢所欲言的空間，然而正如本計畫前面所述，由誰來執行主導，其個人專長領域的不同、尺度的拿捏以及不同時期的可能變化，都會影響社論最後的樣貌。社論這種不署名、看似「忠誠完整」傳達上意的文類，就實際執筆與定調者的角度，其實是一種個人對於宣傳命令不斷地領略、揣磨與修正的書寫任務，因此社論其實充滿了「人」的色彩。同時，若能援引之前的計畫成果，比較不同總主筆的社論方向，與宣傳命令之間的差距誤失，則可能顯示出不同的宣傳人員對政策執行所造成的影響，抑或是不同風格。基於此，本計畫以陶希聖來台後任總主筆時有關國際情勢的社論，作為觀察他如何形塑國際觀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陶希聖個人不同時期的著作，也有助於比對1950年代的特殊之處。其《八十自序》與《潮流與點滴》為自傳式書寫，與陳存恭等人所進行的《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皆著重於1949年之前，提供了大量來台之前參與宣傳工作的細節與心路歷程，以及對國內外局勢的看法，對於理解他1950年代的國際觀有一定助益。[28]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現藏有《陶希聖檔案》一批，包含日記本、記事本、文稿、書信、會議紀錄及剪報等資料，其中日記為1947至1955年，涵蓋本計畫所欲研究的前半時期，亦曾有學者以該檔案中的日記撰寫論文，若能加以利用，想必有關陶希聖對國際大勢的看法將能有更深一層的理解。[29]可惜的是目前此份檔案包括日記仍未完全開放，在有所突破之前，本計畫仍將先以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為研究對象。

阮毅成(1905-1988)是另一位1950年代《中央日報》的總主筆，由於他的全力投入，使其任職期間的社論深具個人意志。他出身中央政治學校法學教授，來台後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社長兼總主筆、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等職。[30]在本計畫所欲討論的四個人當中，他是唯一沒有擔任過第四組主任或副主任的人，不過他在1954-1956年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是1950年代在任第三久的社長，也是宣傳會談、宣傳指導小組、對外宣傳特別小組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31]阮毅成擔任社長兼總主筆期間，對於社論特別重視，不僅強化社論委員會，加聘社論委員，並且負責每篇社論的刪節改動，甚至親自執筆，在兩年多期間發表近800篇社論，應可視為阮毅成思想意志的表現，同樣

確切日期，以及來台前後《中央日報》台北版(1949年3月創刊)如何從搬遷的混亂中趨於穩定，陶希聖何時在台北版發揮實質作用，至今仍未清楚。在釐清之前，本計畫暫時先以台北版創刊的1949年3月作為蒐集資料的起點。陶希聖擔任總主筆的日期，見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頁13-22。

[28]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1967)；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29] 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8(台北，2006.6)，頁165-188。

[30] 林銘章，鄭仁佳，〈民國人物小傳：阮毅成〉，《傳記文學》，65:1(台北，1994.7)，頁132-136。

[31] 阮毅成的任期時間僅次於胡健中與馬星野，陳訓悆不滿一年，蕭自誠與胡健中僅四個月。見上宮美博(輯)，〈六十年大事記〉，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250-253。

地，也可理解為《中央日報》的「阮毅成時期」。[32]阮毅成長於法學，擔任社長之前的政論文章多屬法制與地方自治範圍，其主導下的《中央日報》社論如何秉持命令、呈現國際局勢，為本計畫所欲觀察的焦點。[33]除此之外，阮氏長於筆耕，在南京任教時期就曾寫過不少有關外交與國際政治的文章，著作頗豐，1951年《自由人》三日刊在香港創刊，阮毅成長年參與撰寫「台灣通訊」，不僅報導台灣情形，在發生國際重要新聞時，也闡明台灣對國際情勢的立場，亦是觀察其國際觀的重要材料。[34]其〈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一文，詳述任職《中央日報》時的各項工作，特別是描寫社論上的工作安排與所遭遇的困難，得以一窺社論形成的具體細節。[35]其《八十憶述》(上、下冊)歷敘一生經過，其中有參與《中央日報》及其他刊物編輯的事蹟，對於理解他個人的學養經驗甚有幫助。此外，近年來於《傳記文學》所刊載的〈中央工作日記〉，是阮氏擔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時期參與黨政工作的日記，撰寫時期自1960年5月4日起，目前連載至1962年。雖然此段時間已超過本計畫所設定的範圍，但從其日記中有關國際情勢的判斷，仍有助於理解他的國際觀。[36]

本計畫最後一個考察的對象是李士英(1912-)，他除了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並出版與發表大量關於國際情勢分析的文章，是塑造1950年代台灣人國際觀的重要推手之一。李士英出身河南省淮陽師範，抗戰時參加軍隊政治工作，1943年應黃少谷之邀擔任軍方的重慶《掃蕩報》主筆，專寫國內外戰局分析；戰後該報改為《和平日報》，轉任南京版總主筆。[37]來台後擔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副主委(1951.3.9-1951.8.6)，之後調第四組副主任(1951.8.7-1952.8.8)，[38]，亦是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1957年成立)，於1952至1961年多次擔任過《中央日報》總主筆。[39]李士英任總主筆的時間不長，不過其多次被任命，或許與他長於分析國際情勢有關。相較於其他總主筆，李士英以個人名義發表許多有關國際情勢的作品，如《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綜論1950年代初期的世界局勢，包括美蘇整體戰略、韓戰戰局分

---

[32] 阮毅成在《中央日報》社長時期對社論用力之深，可見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頁19；阮毅成，〈我在中央日報〉，《八十憶述》(下)(台北：聯經，1984)，頁670-674；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下)(台北：海天，1957)，頁519-520。

[33]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頁5-6。

[34]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頁658-660、737。「台灣通訊」中含有台灣觀點的國際分析不少，例如〈由國際大事談到耕者有其田〉，《自由人》，198(香港，1953.1.24)，第2版；〈「中蘇友好條約」應予廢除〉，《自由人》，206(香港，1953.2.21)，第2版；〈由台灣看蘇俄的和平攻勢〉，《自由人》，220(香港，1953.4.11)，第2版。一直到《自由人》最後一年(1959年)，仍繼續刊載「台灣通訊」。

[35]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5-98。

[36]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87:3(台北，2005.9)，頁105-125；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七十)〉，《傳記文學》，99:3(台北，2011.9)，頁137-144。

[37] 李士英，〈我在重慶掃蕩報〉，《中央月刊》，9:9(1977.7)，頁27-54；李士英，〈制憲國大召開前後的思想戰〉，《中央月刊》，10:2(1977.12)，頁44-54；〈李士英〉，收入：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石家莊：河北人民，2007)，頁447。

[38]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71。

[39] 李士英分別於1952.8.11-12.1、1956-?與1961.6.4-1962.2.12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一職。見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22-29。阮毅成，〈我在中央日報〉，《八十憶述》(下)，頁672；，收入：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頁54。

析，以及中共對外擴張的評論；[40]《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則著重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將國際間可能觸發或延緩戰爭的因素做全面性的分析；[41]《國際現勢》也是表現李士英對世界局勢看法的專著。[42]他同時也在介紹國內外新聞的刊物《中國一周》上發表多篇國際情勢的文章，其傳達國際觀於一般人民的努力可謂不遺餘力。[43]

綜合以上四位的條件，均在黨政宣傳媒體中擔任要職，並有質量俱佳的資料可供分析。他們分別從廣播和最具代表性的黨營報紙《中央日報》出發，在 1950 年代的不同時期，直接介入指導與撰寫發聲，負責第一線的宣傳，他們有關國際情勢的文本，包括著作、廣播稿及所負責時期的社論，對於理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深具代表性。然而較可惜的是，對於宣傳決策或宣傳命令的實際撰寫人，如由第四組所發布「宣傳通報」或「宣傳要點」的執筆者，在檔案未開放前仍屬未解。而其他重要的宣傳人員如馬星野、黃少谷、沈昌煥等人，也因資料上的限制，暫時無法深入探討。本計畫不在臚列或細求宣傳人員的周全名單，而是集中於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宣傳命令的執行層面上，觀察個別宣傳人員國際觀的風格、變化與彼此差異。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

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以宣傳人員的著作和《中央日報》的社論為主，並旁及政府與國民黨黨部檔案文件、史料彙編與其他宣傳人員的回憶錄，在多元檔案(multi-archie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補充，拼湊建構出 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探討台灣人國際觀塑造過程中「人」因素。其次在解讀分析上，將所有資料以時繫事，按發表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可在時序中考察不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同時，進一步將編年資料庫中的資料按性質分類，將片斷零碎的資訊加以整合，並放置於具體時空背景下加以思考，以掌握研究對象在當時社會中的定位與影響力。最後，以之前所通過的計畫為基礎，與《宣傳週報》中的宣傳命令相互比對，結合黨政部門等其他相關資料，以尋求個別人員與宣傳命令的立場差異，作為建構個人風格的可能線

---

[40] 李士英，《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台北：中國新聞，1951)。

[41] 李士英，《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台北：中國新聞，1952)。

[42] 李士英，《國際現勢》(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43] 如李士英，〈史達林的亞洲第四戰場〉，《中國一周》，26(1950.10)，頁4-5；李士英，〈世界論壇--蘇彝士之東〉，《中國一周》，305(台北，1956.2)，頁27-28。

索。

五、研究成果

本計畫藉由經費挹助，得以完成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此為基礎撰寫學術論文。以下分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以及研究發現兩方面介紹研究成果。

(一)史料蒐集與資料庫製作

在史料蒐集上，首先從 2011 年 8 月起委請助理協助，影印蒐集四位宣傳人員國際情勢方面的專書著作，以及《中央日報》相關方面的社論。由於該報(臺北版)已有較完整的縮印本和資料庫，資料取得並非太大問題，但在宣傳人員的著作方面，在蒐集階段必須同步閱讀瀏覽，因為許多個人曾經的發表管道或文字訊息藏在回憶式的文章中，因此同步閱覽將可進一步擴大蒐集資料的範圍。

其次，國史館「史料文物查詢」資料庫，與中研院近史所「近代史全文資料庫」及檔案館「外交部檔案」，有關宣傳人員的公私活動，以及宣傳與國際觀塑造的資料，亦在蒐集範圍之中。此部分工作由於範圍甚廣，所須時間較長，在進行至第 3 個月起，同時進行編年資料庫的工作。

2011 年 10 月起針對以上資料製作編年資料庫。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登錄摘要與關鍵字，藉以分門別類，提供分析基礎，並能整合其他性質與來源的史料。由於摘要和關鍵字與日後的分析統計關係甚至，同時涉及研究者對該史料的認識，因此該階段工作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對於後續研究分析，有莫大助益。

(二)研究發現

本計畫從上述的編年資料庫中，掌握了四位宣傳人員的生平經歷，以及在國際觀塑造上的相關工作與文字。這四人雖然資料多寡不一，四人所關切的焦點同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美蘇兩大強權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政」，以及自由與共產集團的角力。由於這四人皆曾執掌黨政宣傳管道的重要位置，因而他們的言論與政府態度亦步亦趨，根本立場並無不同。

唯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差距。曾虛白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忠誠傳達黨意，阮毅成離開《中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

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在特定的關鍵時刻，不同的背景使得不同的人浮出檯面，得以理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背後，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這些宣傳人員在位置上忠誠傳達黨意，並未寫出與黨意違背的文字，與其他時期高層對於《中央日報》的責難相比，意味著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統治，特別是國際觀方面的表述已漸上軌道。此點發現，對於理解 1950 年代台灣的媒體環境，或有一些新的觸發。

此外，藉由考察宣傳人員的個別經歷與學識，在個人較為擅長的議題上，就可看出立論的切入點及所運用資訊的差異。此研究發現對於未來更進一步深入掌握其他宣傳人員的國際觀，具有基礎性的貢獻。在本計畫的支持下，先以資料豐富的曾虛白為中心，已將研究成果於「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中發表。[44]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 年 6 月 8 日。以下將該文收錄於附件，作為研究成果之一部分。

六、參考文獻

(一)史料與專書

1. 《自由人》(香港)。
2.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1984。
3. 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下)，台北：海天，1957。
4. 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1984。
5. 李士英，《史達林怎樣征服世界》，台北：中國新聞，1951。
6. 李士英，《兩個世界：大戰前夕的國際形勢》，台北：中國新聞，1952。
7. 李士英，《國際現勢》，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8.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9. 李楊、范泓，《重說陶希聖》，台北：威秀資訊，2008。
10. 李楊、范泓，《參政不知政：大時代中的陶希聖》，武漢：湖北人民，2009。
11. 沈寧，《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北京：中國青年，2008。
12. 沈寧，《刀口上的家族》，北京：新星，2008。
13. 沈寧，《百世門風：歷史變革中的沈、陶家族》，北京：中國青年，2006。
14.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台北：聯經，1984。
15. 周安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
16. 周安儀，《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
17. 胡有瑞(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台北：中央日報，1988。
18. 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石家莊：河北人民，2007。
19. 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1986。
20. 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21. 陶希聖，《八十自序》，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印，1978。
22.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北：傳記文學，1967。

[44] 林果顯，〈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20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年6月8日。

23.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台北：成文，2001。
24. 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25. 曾虛白，《世變建言》，台北：三民，1969。
26.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1990，。
27. 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頁1-2。
28. 曾虛白，《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29.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30.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31. 鄭貞銘(編)，《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32. 鄭貞銘，〈阮毅成：書中自有千秋筆〉，《百年報人2：跨世紀的報人》，台北：遠流，2001。
33. 鄭貞銘，《百年報人1：報業開路先鋒》，台北：遠流，2001，頁241-256。
34.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二)期刊與學位論文

1.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台北，2009.11)，頁221-262。
2. 李士英，〈世界論壇--蘇彝士之東〉，《中國一周》，305(台北，1956.2)，頁27-28。
3. 李士英，〈史達林的亞洲第四戰場〉，《中國一周》，26(1950.10)，頁4-5。
4. 李士英，〈我在重慶掃蕩報〉，《中央月刊》，9:9(1977.7)，頁27-54。
5. 李士英，〈制憲國大召開前後的思想戰〉，《中央月刊》，10:2(1977.12)，頁44-54。
6.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87:3(台北，2005.9)，頁105-125。
7.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七十)〉，《傳記文學》，99:3(台北，2011.9)，頁137-144。
8. 阮毅成，〈我在台灣曾參加的大眾傳播事業〉，《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5(台北，1980.3)，頁5-98。
9. 林紀東，〈阮毅成先生著「法語」讀後記〉，《東方雜誌》，14:10(台北，1981.4)，頁60-61。
10. 林銘章，鄭仁佳，〈民國人物小傳：阮毅成〉，《傳記文學》，65:1(台北，1994.7)，頁132-136。
11. 姚儀敏，〈人情練達皆文章——訪曾虛白談文藝與新聞事業生涯〉，《中央月刊》，25:6(台北，1992.6)，頁118-123。
12. 郭存孝，〈從新發現的曾虛白日記看抗戰時期的中澳友好關係〉，《傳記文學》，83:2(台北，2003.8)，頁87-104。
13. 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8(台北，2006.6)，頁165-188。
14.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期(台北，1984.4)，頁15-49。
15. 董淑賢，〈曾虛白(1895-1994)〉，《傳記文學》，64:3(1994.3)，頁131-132。
16. 趙友培，〈清才雅識一書生——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阮毅成著)書後〉，《東方雜誌》，13:2(台北，1979.8)，頁77-78。
17. 鮑家麟，〈陶希聖與「極密」件——《蘇俄在中國》一書的寫作與修改〉，《傳記文學》，95:4(台北，2009.10)，頁87-92。

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別於體制面，側重於人的作用，試圖為戰後台灣的宣傳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簡言之，從個別宣傳人員詳細的個人生命經歷著手，為國際觀形塑的背後因素提供基礎性的研究，初步成果在研討會發表，並投稿通過學術期刊審查，已達成原先計畫所設定的目標。

在學術價值和主要發現上，本計畫成果應可作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具有延續性。戰後台灣人國際觀的塑造，一直是尚未全面性而完整考察的議題，本計畫

在之前《宣傳週報》對宣傳命令的疏理，及《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的比較研究基礎上，放進人的因素，使此議題的討論更為完備。透過觀察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等四人對於國際觀的特殊觀點，尋找個人因素在整體官方國際觀宣傳中的影響。這四人雖然資料多寡不一，但在共同點上，四人所關切的焦點仍然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美蘇兩大強權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政」，以及自由與共產集團的角力。由於這四人皆曾執掌黨政宣傳管道的重要位置，因而他們的言論與政府態度亦步亦趨，根本立場並無不同。

唯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差距。曾虛白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交事件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忠誠傳達黨意，阮毅成離開《中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在特定的關鍵時刻，不同的背景使得不同的人浮出檯面，得以理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背後，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其次，本研究尚有開創性。這些人物其實尚有公私資料有待更進一步的開拓整理，其餘宣傳人士的國際觀也還有待分析。人的因素在黨的指揮下，雖然被盡力抹平，但若能在關鍵的特定事件，整合各類檔案，勾勒出更為鮮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皆為未來研究發展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成果可填補既有研究上較未受注意的環節，並開啟新的研究議題，或可更加豐富 1950 年代台灣史的研究。研究的初步成果已在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並已通過《國史館館刊》審查。此議題適合繼續深入擴大，發表於期刊上，與其他學者進行交流。

八、附件：研究發表文章

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

林果顯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在國民黨歷經重大挫敗，於臺灣重起爐灶時，究竟如何在台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體經營與改進宣傳內容，一直是個尚待投入的議題。過去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多半集中於管制異議聲音的消極性面向，對於國民黨如何進行宣傳的積極性作為相對較少著墨，特別是執行人員的行事面貌更顯模糊。曾虛白於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身兼數個重要宣傳部門職位，本身又有豐富的傳記資料與撰述，或可由其宣傳工作及理念，透過政府檔案的補充修正，一窺國民黨來台後重整宣傳體系的部分具體過程。

本文發現，來臺後國民黨宣傳體系的重建方向圍繞著蔣介石為中心，與蔣的親疏遠近成為宣傳官僚發展的重要憑藉之一，但曾虛白始終未進入最核心的決策圈，限制了他在該體系的發展。在宣傳工作上，來臺初期可能從事情報調查工作，在風雨飄搖之際服務於蔣，任職第四組主任時也致力將黨義與領袖意旨傳達給民間。任職中央社時運用豐沛的媒體網絡，在「吳國楨案」中積極協助政府進行宣傳戰，任職中廣時參與對大陸心理作戰節目規劃，並以長達二十年的國際新聞評論節目，塑造臺灣人的國際觀。在理念上，基於三民主義，他堅持記者身為後知後覺者的社會責任，以及將黨與公的概念劃上等號。整體而言，曾虛白言行合一，代表了改造時期的精神，但其學說理想，終未實現。

---

* 本文首先發表於〉，「20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年6月8日。修改後投稿《國史館館刊》，於2013年10月23日通過審查，待刊中。

一、前言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對於執政的國民黨而言，無疑是其革命事業中幾近毀滅性的挫敗。隨著韓戰爆發，美國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國民黨獲得喘息機會，得以思考失敗原因，準備重頭做起。[45]在這當中，宣傳工作被認為是丟失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共內戰期間輿論幾乎倒向共產黨，政府作為無法被人民理解，重要友邦如美國也同情共產黨，如何在台灣徹底扭轉此種劣勢，成為相關部門的當務之急。國民黨在台重建宣傳指揮體系，整頓媒體經營，改進宣傳內容，這些過程成為理解國民黨來台後如何鞏固統治的重要事例。然而，過去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囿於資料開放程度，多半集中於管制異議聲音的消極性面向，對於國民黨如何進行宣傳的積極性作為相對較少著墨。[46]來台後宣傳部門究竟做了哪些興廢調整？過程是否順暢無礙？在哪些關鍵時刻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問題皆尚待進一步解決。

在宣傳部門中實際執行任務的人，其面貌更加曖昧難明，相關資料與研究益屬稀少。這群人預聞機要，協助高層彙整資訊，提供初步判斷，並將經過篩選與調整的訊息向外傳達，以維護或創造政府形象，若能對關鍵人物掌握一二，對於來台後宣傳工作的實況將能更加釐清。然而，也許基於許多宣傳工作事涉機密，相關的機構檔案外人難窺堂奧，曾經參與人士的回憶，若不是僅止於片斷事蹟，就是層級有限，而較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自述大部分集中於 1949 年之前，對於來台後的行事內容語多不詳，增添了研究的阻礙。[47]

曾虛白是少數可以突破上述障礙的重要案例。作為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同時身兼第四組主任、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與中央通訊社社長，曾虛白可謂是 1950 年代初期宣傳官僚的代表性人物。他又創辦在台復校的政治大學新聞系所，擔任中華民國通訊事業協會、國民黨新聞黨部、中國新聞學會的主持人，對於戰後台灣媒體環境的塑造影響深遠。與其他宣傳人員不同的是，他對於自己來台後從事的工作留下了大批的文字，對於分析考察有莫大幫助，而藉由近年來開放的檔案資料，也供研究者確認、修正及補充自傳不足或隱匿之處，有助於重構曾虛白宣傳工作的面貌。

過去關於曾虛白的研究並不多，主要有邱家宜與楊秀菁的著作。邱家宜從「感知結構」出發，追尋曾虛白的生平經歷與新聞理念之間的關係，分析其在中華文化霸權中的社會文化實

---

[45] 有關美國在韓戰前後對臺政策的不同立場與有展，請見張淑雅，《韓戰救台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2011)。

[46] 在法規管制方面，對報禁與言論取締等議題特別關注。如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47] 如蔣介石的重要幕僚陶希聖，對抗戰期間描述甚多，來台後的經歷卻幾乎不提。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1964)；陶希聖(口述)，陳存恭、蘇啟明、劉妮玲(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即使陶希聖有留下1949年之後的片斷日記，但此資料閱讀使用未臻公開，目前對此的研究成果也少涉及宣傳事務。見陳華，〈「行憲」與「戡亂」——陶希聖日記(1947-1953)的觀察與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8(2006.6)，頁165-188。

踐位置，以及其認同樣態。[48]楊秀菁則是從新聞自由概念在戰後台灣的引入、翻譯、篩選與轉化中，定位曾虛白的影響。[49]兩位在各自的關懷面上，提供了理解曾虛白的重要基礎，不過也因為著重於和其他新聞界人員的比較，對於曾虛白從事宣傳工作的詳細實況較少著墨，這也是本文意欲填補的空缺。

因此，本文想問的是：來台後曾虛白從事的宣傳工作具體內容是什麼？在特定事件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又有哪些理念支持他做這些事？本文將以曾虛白的自傳與豐富撰述作為基礎，配合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及「外交部檔案」，拼湊建構曾虛白來台後更完整具體的宣傳工作，以及他所論述的宣傳理念。經由曾虛白的研究，對於國民黨來台初期宣傳體系的重建過程，或許可以得到更進一步地理解。

二、生平簡介

曾虛白(1895-1994)江蘇省常熟人，出身漢學世家，後考進上海聖約翰大學，接受新式教育洗禮。畢業後曾任英語教師、煙酒公賣局、天津交涉公署英文科科長，1926 年參與創辦天津《庸報》，首次接觸新聞事業。1927 年至上海協助父親創立真美善書店，主編《真美善》文藝雜誌。1931 年應聘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同年秋籌備創辦上海《大晚報》。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曾虛白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同年 11 月組織調整，改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聯絡國際人士，宣傳國民政府抗戰事蹟，1943 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培育宣傳人員。1947 年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8 年底辭職，隔年春來臺。[50]來臺後初期身兼數個重要的宣傳職位，不僅是中央改造委員兼第四組的主任，同時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也是宣傳會談成員與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長年任職於國民黨的的宣傳機構(見表一)。在黨職以外，對於戰後台灣媒體樣貌的塑造亦扮演關鍵性角色，1955 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成為新聞系所主管，繼抗戰後培育新生代的記者；1965 年奉命成立新聞黨部，成為首任主任委員，[51]1966 年推動成立中國新聞學會，亦當選主任委員(1966-1972)。[52]同年主編的《中國新聞史》出版，成為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主要教科書，對新聞史的教學提供典範。[53]整體而言，曾虛白對戰後台灣新聞記者的養成、傳播理論的引介與把

---

48 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臺北：世新大學傳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49 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

50 曾虛白生平主要根據以下資料撰寫：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新聞學研究》，33(台北，1984.4)，頁15-49；董淑賢，〈民國人物小傳：曾虛白(1895-1994)〉，64:3(台北，1994.3)，頁131-132；〈曾虛白先生生平事蹟〉，《國史館館刊》，復刊16(1994.6)，頁254-256。

51 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頁3；邵銘煌、薛化元(主編)，《總裁批簽》(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中國國民黨黨史館，2005)，頁499-500；〈中國國民黨新聞黨部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就職宣誓一瞥〉，〈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五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50101-00058-241，入藏登錄號：002000000058P。

52 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37、42。

53 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頁144；林麗雲，

關，以及媒體環境的塑造，影響深遠。

表一　來台後曾虛白重要黨職任期表

	職位	時間
1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	1950.8.5-1950.10.13
2	中央改造委員	1950.8.5-1952.10.9
3	中央通訊社社長	1950.10.2-1964.12.21
4	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	1949.11.16-1954.5
5	中央宣傳指導委員會委員、綜合小組成員	1957.4.17-1963.11.23
6	中央評議委員[54]	1957.10.23-1999.8.27

資料來源：

1、2：《彙編》，頁1、43；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263-268。

3：〈中央社今日交接　曾虛白就任社長〉，《中央日報》，1950年10月2日，第1版；〈中央社新任兩首長　曾虛白馬星野接事〉，《中央日報》，1964年12月22日，第3版。

4：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五　中國廣播公司》(臺北：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1972)，頁6。

5：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91；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臺北，2009.11)，頁230-234。

6：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94、308、330、357、374、396、428。

三、宣傳官僚的角色

欲了解曾虛白在宣傳上作為的可能性與限制，或許應先從宣傳官僚在戰後台灣黨政體系中的角色加以理解。宣傳部門橫跨黨政軍，決策主管機關遞嬗頻繁，宣傳事項又涉及隱秘，加上檔案開放的有限，種種因素使得宣傳官僚的日常行事不易掌握，個人在特定事件上的著力與影響也難以釐清。然而從既有的資料中倒是可以清楚地察覺，不論組織規程如何釐定權責範圍，整個宣傳體系明顯地以一人為中心，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意志清楚地浮現於各處片段的檔案。而身為國民黨的宣傳官僚，黨內地位的高低也影響了執行業務的力量。在以蔣為首的宣傳體系下，曾虛白與高層的親疏遠近，以及在黨內的發展軌跡，成為理解曾虛白宣傳工作以及所持理念的重要背景。

(三)以蔣為首的宣傳體系

1950年代的宣傳體系規模龐大，可概分為決策、執行與業務三個層次。決策層次為蔣介

《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頁104-110。

[54] 曾虛白從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開始，一直擔任中央評議委員，受限於資料，只知至少擔任至第十四屆。中央評議委員為改造結束後新設立的組織，職責為建議黨政興革、審議重大紀律案件、中央委員會提請評議事項，以及供總裁諮詢。雖無實質權力，至少代表對曾虛白效力黨國的肯定。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73。

石主持的的宣傳會談，以及協助決策、屬於幕僚機構的中央宣傳業務小組(1951年成立)、中央宣傳指導小組(1954年成立)和中央宣傳指導委員會(1957年成立)。這些組織的成員皆包括黨政軍宣傳機構負責人，目的在統合與協調各單位的宣傳方向。執行層級則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為主，負責執行宣傳決策層級所下達的指示，但以自由地區為主要負責區域，海外宣傳歸第三組，對大陸心戰則為第六組，理論研究由設計考核委員會理論組擔綱。[55]業務層次則包含各種黨營媒體，例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央通訊社、中國廣播公司等等。

不論是國民黨或政府部門，對內或對外，決策、執行到業務三個層次均有專責機構，不過，在組織章程所制定的運作規則之外，隨時可見的是領袖的身影。首先，每週二在總統府召開的「宣傳會談」，確立蔣介石對宣傳事務的了解與決策權力，出席的基本成員包含府院黨高層(行政院長及三位秘書長、宣傳與外交部門首長(第四組主任及外交部長)、宣傳業務負責人(中央社、中央日報、新生報社長)，以及其他視當日議題而邀請的人員。[56]由於目前台灣各公私檔案收藏處並未開放該會談的記錄，只能從與會人員片斷的記述，略知該會議的規模與討論議題。從蔣介石的日記與會談成員的回憶錄可以發現，國內外發生大事時的宣傳方針，多由蔣拍板定案。[57]蔣介石對宣傳事務的關心、介入與批評躍然於史料之上。

其次，在跨越黨政軍成員的宣傳會談之外，蔣的身邊另有侍從秘書的編制，亦涉及宣傳事務。蔣的秘書分為機要、英語翻譯以及新聞言論三類，機要負責公文收發、核稿與協調，英語翻譯專管國外人士的陪見與口譯，新聞言論秘書則包含：聯繫媒體與發布新聞稿；整理每日報紙；陪見客人，筆記談話內容；蒐集資料以供寫作參考；記錄彙整蔣重要演講與會議指示。[58]因而蔣身邊的新聞言論秘書不僅須彙整外來的新聞情報，亦有將蔣的消息對外發布的重要職能。新聞言論秘書的常規工作之一，是在每天早上七點一刻之前，須將當日報紙以紅藍鉛筆勾劃標記，依《中央日報》、《聯合報》、《徵信新聞報》、《新生報》、《中華日報》依序排列，送交侍從副官，置於蔣榻旁的几案上，待八點蔣用早餐時，由武官讀報。下午蔣閱讀香港出刊的中文報紙，以及中央社所編印的重要參訊，亦經新聞言論秘書檢視呈閱。[59]甚且蔣對於印象深刻的文章作者，若為國內人士則予以召見，國外人士則查其資歷背景。[60]由此可知蔣自身對於報紙輿論的重視，不論黨營系統或民間報紙，均安排每天掌握，這意謂著即使是宣傳體系較末端的業務成果，每天皆接受領袖的檢視。蔣就曾針對《中央日報》所刊照片不

---

[55]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頁222-228。

[56] 在曾的自述中，皆以「宣傳會報」稱呼「宣傳會談」，但學者任育德指出應為「宣傳會談」。此外，雖然任育德根據1959年的國民黨內部工作檢討報告，說明宣傳會談兩週一次，但從曾虛白及楚崧秋兩位親身與會人士的回憶來看，1950-1958年宣傳會談應是每週一次。見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頁226；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512-513；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68。

[57] 例如美國雜誌刊登對中華民國不利之文章，或是中日台北和約簽定的宣傳事項，均由蔣指示宣傳原則。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頁106-107。

[58] 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3。

[59] 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4-65。

[60] 楚崧秋，《滄海微言：隨侍　先總統蔣公一得》(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6)，頁161。

滿意，指示懲處負責人。[61]

新聞言論秘書與高層的親近關係，使蔣得以近距離觀察這些秘書的辦事能力，許多人後來成為宣傳部門的主管，如蕭自誠、秦孝儀、曹聖芬、楚崧秋等人，兩位第四組主任沈錡與沈昌煥雖屬英語翻譯系統，亦屬側近，[62]而兩大文膽陳布雷與陶希聖也出身侍從室。雖說宣傳方面的負責人不一定要出身秘書，但可知整個黨政軍宣傳體系與蔣個人的密切關係。

由此點來看，曾虛白很難稱得上躋身最核心的圈子，這或許限制了他在宣傳體系中更上層樓的可能。在曾虛白的生涯中，與蔣接觸最頻繁的機會僅限第四組主任時期，就其自述當時幾乎每天與蔣碰面，除了例行會議外，還會就國際問題經常討論，而在此之前的大陸時期，僅僅見過兩面。[63]即使為真，第四組主任任期也只有兩個多月，對照其他侍從出身人員每天接觸領袖，親疏遠近相當明顯。欲測知與蔣的關係還可用另一個方式側面觀察，亦即蔣自身的文字記述與公文檔案中，提到特定人物的次數與內容。然而不論是《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中所收錄蔣的日記，或是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往來電文，幾乎很少提到曾虛白。或許某些人常被提到是因為被蔣厭惡反對，不代表與蔣親近，但這至少表示在其心頭上或公務中一個人份量的高低，檔案中曾虛白並非是重要人物。

由以上可知，從宣傳事項的最高決策會議，自身隨侍人員的宣傳系統，到最末端的媒體呈現，可說均在蔣的掌握之中。對領袖而言，宣傳事務不分黨政軍等法定部門的區別，但求有效整合，發揮最大的作戰力量。因而宣傳人員的角色，設定為秉承上意，忠實傳達黨政高層的意志，很少有自主的空間，遑論對政府進行有力的批判與監督。與蔣的親疏遠近，以及在宣傳體系中歷練的位階層級，可說決定了宣傳官僚的影響力。曾虛白在宣傳體系中的定位，或許可從這些角度加以觀察。

(四)黨內位階的沉浮

曾虛白最重要的職位集中於 1950 年秋天，當時不論在黨組織或宣傳部門，其職位達到人生的最高峰。在國民黨凍結第六屆中央委員職權，由總裁指定十六名委員取而代之推動黨務革新時，曾虛白成為十六名改造委員之一，躋身權力核心，同時兼任中央改造委員會(以下簡稱中改會)第四組主任，成為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此外，在改造之前即擔任的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一職並未更動，更於當年 10 月接手中央社社長，成為既是宣傳部門又是黨營媒體的主管。雖說職位與所擁有的真正權力並不完全相等，人脈關係、特殊才能以及獲得高層重視等因素也同樣左右一個人的影響力，但檢視之後的發展，不論是職位或與領袖的關係，曾虛白再也沒有如此靠近核心的機遇。

---

[6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頁317

[62]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68、282-283、300-301316-317、366。楚崧秋，《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62。

[63]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870-873。

宣傳被視為丟失大陸的原因之一，也是改造的重點工作，但改造期間黨的宣傳主管人事卻不能稱上安定。在兩年兩個月的改造期間，統籌黨政軍宣傳事務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其主管更替頻繁，首任的改造委員兼第四組主任即為曾虛白(1950 年 8 月)，但上任僅兩個月多即由總裁蔣介石提出曾的辭職案，由原任設計委員會主委的陶希聖接任(1950 年 10 月)。[64]陶也僅擔任 9 個多月，同樣由蔣提出陶的辭職案，並調設計委員會主委蕭自誠接任(1951 年 7 月)。[65]蕭擔任時間最長，但也僅 13 個月，與原由設計委員會調來的副主任李士英一同被轉派去整頓《中央日報》，擔任社長與總主筆，原《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轉調設計委員會副主委，第四組主任改由沈昌煥接任，但此時也已接近改造的尾聲(1952 年 8 月)。[66]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仍由沈昌煥擔任，之後第四組主任人事更迭趨緩，這才告人事穩定。[67]由此可知，改造時期高層對於宣傳事務交由誰負責仍處於摸索變動的狀態，而由人事的安排，也可看到高層習慣在宣傳、設計、黨營媒體三個領域之間調動主管，若考量當時第四組還兼組織工作(小組)，而其他組也兼宣傳工作(第三、六組)，從組織架構而言，國民黨對於宣傳事務的專業性認知以及主管部門的職權範圍，或許尚未確定下來。

在此過程中，有些人位子雖然變動卻依然與聞重要決策(如陶希聖)，但曾虛白可說最早被排除在核心之外。曾虛白雖名列十六名改造委員之一，但在黨職上一直未能更上層樓，不僅是中央改造委員會裡最早辭職的一級主管，且出掌黨營媒體後就再也沒有回流至黨中央擔任主管。[68]在改造結束後由蔣介石提名、國民黨全國代表所投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選舉中亦無法當選，自然更無法進入中央常務委員會。若思考中常委是由 32 名中央委員裡選出 10 名，而這 10 名中有 6 名是原先的改造委員，可說隨著時間推移，曾虛白離黨的決策核心越來越遠。[69]其主要舞台轉移至黨營媒體，也就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與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70]從上一小節的衡量標準來看，曾虛白在宣傳體系中的歷練層級曾經短暫達到高峰，但仍無法稱上最高級的幕僚。

若由黨內派系來分析，曾虛白並沒有明顯的所屬派系。但在黨內政治要人中，他較親近的是當時的第二號實力人物陳誠，而非已步上接班之路的蔣經國，這對他的發展或許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曾虛白並不掩藏他與陳誠的良好關係，兩人結識於淞滬戰爭時期，是曾虛白最欽佩的行政長官。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推行土地改革，需要宣傳配合，兩人在改造委員

---

[64] 中改會第37次會議記錄，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以下簡稱《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頁43。

[65] 中改會第175次會議記錄，《彙編》，頁219。

[66] 中改會第382次會議記錄，《彙編》，頁474。

[67]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82。

[68] 同時期辭職的只有幹部訓練委員會主委蔣經國。中改會第37次會議記錄，《彙編》，頁43。

[69]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277-278。蔣介石亦注意到曾虛白未當選一事。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一，頁261-262。

[70] 中央社究竟是黨營、國營或民營，在1950年代初期即產生困惑，曾虛白希望朝向國營發展，但終究只是黨營，詳細討論可見本文後半部。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82-584。

會開會時常以紙條擬定合作辦法，而陳誠下鄉時也常找曾虛白同行。[71]甚至曾虛白在改造委員會中第一次提出大型改革方案時，引用的話語和例子也是陳誠，而非他人。[72]相對地，為了政府規定軍事新聞只能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統一發布，中央社與該部的軍聞社互相競爭，曾虛白的文字中對此透露出些許不平之鳴。他反對軍事新聞由軍聞社獨家發稿的理由是：[73]

> 它不獨堵塞了中央社在這國軍顛危的時期阻塞其以世界性的傳播功能配合軍方戰鬥有效貢獻之路，同時也把這樣一個國運生死存亡所寄的鉅大任務交給一個毫無傳播認知的官僚機構去負擔執行。

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部長為蔣經國，曾虛白雖未明講，但暗示該部不懂媒體卻欲經營媒體，或可屬間接批評。雖然他對於面見蔣經國後兩社得以同時發布軍事新聞稿，肯定蔣經國的開放態度，又藉第一次台海危機時中央社金門特派員的例子，指出「他的電訊得到佔先的優勢，實際他的成功是經國先生一言的賜予」，讚揚了蔣經國，但他對於兩社搶發軍事新聞或是軍聞社漏發新聞給中央社的事情多所描述，又對國內外各媒體多引用中央社的軍事新聞感到自豪，可見得曾虛白並未接受軍聞社成立之必要。[74]曾虛白或許並無與蔣經國交惡，但從其專業範圍與蔣經國的往來經驗，相較與陳誠的互相配合，遠近親疏可見一斑。

整體而言，曾虛白非出身側近，與高層關係未如其他宣傳官僚緊密，這使得他在當時以蔣為首的宣傳體系中，一直未能進入真正最核心的圈子。在黨內位階的歷練上，最重要的時期集中於改造初期，之後長期主掌黨營企業，未曾再回到決策部門。而其並未有明顯的派系背景，雖屬清新，卻也少了奧援，最親近的陳誠終究止步於副總統，而和已展開接班態勢的蔣經國並不熱絡。這些因素，可能限制了曾虛白在國民黨宣傳體系中的發展，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黨的忠誠與努力表現。

四、宣傳工作

(五)來台初期的工作之謎

反覆翻閱《曾虛白自傳》，對於 1949 年春天來台後至該年底(11 月)擔任中廣副總經理之間，究竟實際從事何種工作幾乎一片空白，僅強調此時有感時局變化，苦思改革之道，寫下文章受到蔣介石青睞，並因此成為改造委員的前因後果。但實際上，曾虛白初來台灣，很可能秘密協助蔣介石，對此一即將成為最後堡壘的土地進行強化統治的準備工作，具體而言，是進行情報蒐集工作。

1949 年 1 月蔣介石下野前後，已開始布置鞏固台灣的相關事宜。1949 年 6 月，曾虛白的

---

[71]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20。
[72] 〈確立本會重點主義的工作方案案〉，中改會第7次會議記錄，《彙編》，頁7。
[73]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63。
[74]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32-640。

老長官董顯光(中宣部副部長)奉蔣的命令，擬定國際宣傳與組織調查兩機構的工作任務與運作計畫。[75]這兩個組織不隸屬於任何黨政軍單位，而是直屬於蔣。組織調查機構目的在蒐集民間隱情，整理後供蔣參考，對外以「中國新聞社」的名義蒐集資料，設置主任、佐理、繕寫、調查人等。所蒐集資料分兩種，獲得線索後派專人搜集佐證者稱為特別資料，一般約詢訪談所得稱為普通資料，但不論何者，有特殊貢獻者另給獎金。其主要任務如下：[76]

一、在台所能接觸聞見之外國人士對我政府之批評，及國際間幕後秘聞。

二、台灣本地人對我政府之批評。

三、社會領導人物對我政府之建議與指摘。

四、政府機構貪污之事件。

五、政府機構失職之事件。

六、中央在台事業機構與省辦事業機構彼此間之磨擦與任務重複以及其他不合理之現象。

七、在台海陸空軍在民間之表現。

八、走私事件。

九、匪諜活動事件。

十、其他人事磨擦與各機關首長以及公務人員不能上達之隱情。

由以上計畫可知，這個直屬於蔣的情報蒐集組織，並不避諱國民黨執政的政府所可能引發的問題，而是切實想了解在台灣的外國人、本地人、領導人士對於政府的觀感與批評，特別關注政府部門的負面事件。按理當時國共戰爭如火如荼，防堵中共在台活動應為重中之重的工作，但相關事項僅有「匪諜活動」一條，反而對於中央在台事業機構與省辦事業機構彼此的磨擦，以及下情不能上達等事項，展現相當細膩的關心。乍看之下，此調查機構的任務較像是蒐集政敵的弱點，而不像是支援由蔣的心腹陳誠所主持的省政，但可感受到的是積極且徹底認識台灣與陳誠施政的企圖。

董顯光在此計畫中大力推薦曾虛白，而且請他負責的不是國際宣傳，反而是組織調查。

---

[75] 董顯光與曾虛白認識既早且久，可說是將曾虛白引入新聞事業與黨政宣傳工作最重要的人士。1926年曾虛白結識董顯光，追隨他加入天津《庸報》行列，為曾進入新聞事業之始，1931年又因董的介紹籌備創辦上海《大晚報》。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亦因董顯光從此轉入黨政部門工作，在董顯光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時，擔任第五部所屬國際宣傳處處長，之後組織調整，董顯光成為中宣部副部長，曾虛白則為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43年重慶創設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董兼任院長，曾則為副院長。來臺後董是中廣總經理，曾是副總經理。顯見董顯光在工作上一路提攜曾虛白，董顯光在他的自傳中盛讚曾虛白對他工作的大力協助，而此一英文傳記的中譯本，亦是由曾虛白翻譯負責，可見兩人淵源之深。見董顯光(著)，曾虛白(譯)，《董顯光自傳：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台北：台灣新生報，1981)，頁209-210。其他兩人密切的生平請見：曾虛白，〈追思董顯光先生〉，《傳記文學》，42:1(台北，1983.1)，頁30-32；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臺北：經世書局，1986)，頁15-16、33；樂羽嘉，〈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傳遞與實踐——以董顯光和馬星野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頁38-39。

[76] 「組織調查機構計畫」，〈沈昌煥呈蔣中正組織調查與國際宣傳機關計畫核示經費人員等意見〉，〈國防情報及宣傳（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10-006，入藏登錄號：002000001233A。雖然國史館所編卷名為沈昌煥，實則根據內容，應為董顯光所呈公文。

其實早在中日戰爭前，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曾虛白即協助董顯光擬定情報組織計畫，之後董顯光將此構想傳授戴笠，因之曾虛白譽董顯光為中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77]依董顯光的計畫，該機構由魏景蒙以「中國新聞社」社長主持，董顯光在呈給蔣介石的公文中並如此強調「曾虛白同志願不居名義從旁協助之。兩同志皆為光十餘年之老幹部，忠實可靠，可以保證」。[78]從董顯光所推薦的人士可知，這個擬議中直屬總裁的組織，人事與過去國際宣傳處關係密切，更重要的是，曾虛白刻意地「不居名義」，隱秘進行，這或許也是為何在自傳中對此段日期的作為未加著墨的原因之一。

該組織調查機構的運作實情與成效，曾虛白在此中究竟做了些什麼，目前尚無資料可供檢證。不過，1950 年 3 月董顯光在蔣介石復行視事時，曾上呈一份公文，交代所辦宣傳工作事項的相關費用單據，可知原提兩機構的工作計畫至此時已告一段落。在此公文中主要陳述的是上述國際宣傳機構的成果，但在經費表的「秘密費」項下，有個「(1)搜集民情資料費(蔣經國先生主持)1000 美金(2)津貼某西記者」，倒是透露了國際宣傳工作中亦隱含蒐集民間情報的工作。[79]

曾虛白願不計名份工作，受老長官推薦身處直屬總裁的組織下，且蔣對該計畫亦批「閱」而未有反對意見，可見得也認同此一人事安排，可說在蔣因勢下野、眾多同志叛離蔣之際，曾虛白反而增進了一步與高層的關係。曾虛白在其自傳中對此事隻字未提，反而以專章敘述其萬言書〈革新芻議〉的撰寫由來與內容，並說明因該文刊載於《中央日報》而受到蔣介石的接見慰勉，認為蔣對其說話的內容「言外之音，顯然表示，讀拙作後決邀我參加黨之改造工作了」。[80]實則查閱《中央日報》，並無〈革新芻議〉為標題的文章，而是分為〈黨議新詮〉和〈論黨的革新〉發表，刊登時間分別為 1950 年的 2 月與 7 月，他獲高層垂青進入改造委員會的真正原因並不可知。[81]總之，若組織調查機構的計畫確實執行，則曾虛白與蔣並非僅僅「以文相會」，而是在情報調查的工作上，蔣已對曾的能力與忠誠有所觀察，若僅止於計畫，蔣也認同曾虛白可為自己做事。如此，既可填補其自傳中 1949 年如何營生的空白之處，又可對於曾虛白何以被選為改造委員，並被委以宣傳主管重責的理由提出較合理的解釋。而調查機構的主力多為宣傳人員，亦可由此而知宣傳與情報的密切關係。

---

[77] 在曾虛白自己的文章裡，進行此工作的時間略有出入，〈懷念顯光兄(代再版序)〉一文寫的時間是1929、1930年，自傳中則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以後。曾虛白，〈懷念顯光兄(代再版序)〉，收入：董顯光(著)，曾虛白(譯)，《董顯光自傳：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再版)，頁7-8。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臺北：聯經，1988)，頁174-175。

[78] 〈沈昌煥呈蔣中正組織調查與國際宣傳機關計畫核示經費人員等意見〉，〈國防情報及宣傳 （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10-006，入藏登錄號：002000001233A。

[79] 〈董顯光呈蔣中正所負責宣傳工作於組織調整前業務費用並赴收支對照表等單據簿〉,〈國防情報及宣傳（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10-012，入藏登錄號：002000001233A。

[80] 標點為筆者所加。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450、469-470。

[81] 曾虛白，〈黨議新詮〉，《中央日報》，1950年2月13日，第2版、1950年2月14日，第2-4版；曾虛白，〈論黨的革新〉，《中央日報》，1950年7月6日，第3、6版、1950年7月7日，第3、4版。

(六)第四組主任之工作

在曾虛白的宣傳工作生涯中，第四組主任無疑是權力最重的位置。在短暫兩個月多的任期中，他努力扮演忠貞黨員幹部的角色，在宣傳事務與黨務上積極擘劃改造工作。其主要作為包括擔任宣傳會談秘書與聞決策、針對重要文告擬定宣傳辦法、整頓黨營媒體事業，並提出影響全黨方向的工作方案。儘管時間短暫，仍可從中看出曾虛白擔任宣傳主管的權限範圍。

第四組主任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於以此身分擔任的宣傳會談的秘書。前已述及此會談的重要性，是由總統所主持關於宣傳方面的最高決策會議，第四組主任在此可了解高層意向、提供專業判斷，並且與不同部門幹部協調合作。曾虛白須就過去一星期國內外大事作一綜合報告，供與會者討論後作出結論，並針對當天討論議題，擬定邀請名單，供蔣介石核定。此份工作頻繁而吃重，特別是綜合報告並非單純剪報排比，若無綿密而專業的情報網支持，無法提出真實深入的重要政情資訊。曾虛白自述利用同時身為中央通訊社社長之便，蒐集海內外重要資訊，更動員黨政中央地方數層級的主要宣傳人員，提供原始消息建立資料庫。曾虛白自認其報告「深得　蔣公之倚重，而成他決定宣傳指示、也幾乎是制定國策的依據」。[82]然而曾虛白擔任中央社社長後十天即辭去第四組主任，此段敘述若為真，能以身兼兩者主管身分加以運用的時間無法太長。不論其回憶是否為真，可以確定的是，對曾而言，擔任宣傳會談的秘書一職且提出國內外大事報告意義重大，同時深覺受到總統重視，是他參與重大決策的主要管道，這或許也是為何他在自傳裡特別提及此事的原因。

曾虛白在組內的重要業務之一，為擬定重要文告的宣傳計畫。時值改造之初，為了昭示革命事業進入新時期，1950 年 9 月 1 日國民黨公布〈現階段政治主張〉以顯示決心。該文件認為一切應從建設台灣做起，提出恢復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實行民生主義經濟措施與完成三民主義的民主政體的主張。[83]由於此文事關改造事業的觀感，因而其撰寫與宣傳被列為改造後急切工作的第一項，並由第四組負責擬定宣傳計畫。[84]在〈現階段政治主張〉發表的隔天，中改會通過「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發表後之宣傳要點」，針對該文做了基本的宣傳指示。其方式是首先利用各種方式的會議與演講辯論，由黨中央推及至各級黨部，再由黨員發動民眾團體與教育文化機關，以通俗有趣的方法推廣。在分工上規定第四組負責文字、口頭與藝術宣傳等技術，鼓勵各級黨部、文化宣傳機構與文藝學術團體對該文作詳細的介紹與評論，且應隨時發布宣傳指示與考核成效，同時，負責國際宣傳，供應資料給各國駐台記者與中華民國駐外單位；第一二組辦理宣傳運動；第三組負責海外僑胞宣傳。[85]嚴格來說，此份宣傳要點談不上具體，因為什麼是「各種方式之會議」與「通俗而有趣的方法」，可能是一般黨員在推廣時最想得知的技巧，相較於之後的宣傳計畫常明確指出以廣播、壁報、競賽、標語等方法，

---

[82]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13.

[83] 中改會第13次會議記錄，《彙編》，頁14-17。

[84] 「本會當前急切工作要項」，《彙編》，頁9-10。

[85] 「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發表後之宣傳要點」，《彙編》，頁18。

此時的宣傳要點尚屬簡要。然而在這份改造後首次由黨中央通過的宣傳要點中，可看出各組在宣傳上協同配合的掌職，以及第四組所應負責的工作領域，其中聯絡並提供資料給外國駐台記者與駐外單位等事項，明顯是擔任過國際宣傳處處長的曾虛白最熟悉的範疇。

其他第四組主任時期被交付研擬宣傳方案的，還有蔣介石所發表〈為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一文。根據中改會的決議，第四組除了應擬定「宣傳綱要」外，亦須策劃「研究綱要」，以發動：1、由中改會分發各級黨部小組會議討論研究。2、由國防部政治部分發各部隊討論研究。3、由教育部指定為大、中學生課外讀物，於紀念週及各種重要集會時，加以講解，並作為歷史公民考試成績之一。[86]另外，中改會也決議要求第四組針對「革命民主政黨」一詞當中，革命與民主理念可能引起衝突或迷惑的危機加以決定，要求第四組在宣傳的議中多所解釋。[87]從這些黨中央的決議中，可以略知曾虛白如何協助黨將核心概念與領袖意旨下達於基層的努力。從表二來看，即使離開第四組主任位置，曾虛白仍舊參與許多關於宣傳事項的臨時任務小組，但除了最熟悉的對外宣傳問題，其餘小組均未擔任召集人，可知他在相關事務上的專業獲得信任，但對於擔任領導位階則有限度。

曾虛白在第四組主任的另一個重要任務為整頓黨營媒體。改造初始，中改會即認為黨營新聞事業(例如中央社)應在改造時期有一整體的整頓計畫，並推張其昀等七人組織小組，負責審議，曾虛白作為第四組主任，亦在此小組中。[88]雖然目前無法掌握此一決議後續的執行概況，但曾虛白在黨營媒體的人事方面有所介入，例如《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的董監事人選，即由曾虛白召集小組研商審議。[89]

兩個月多的任期應非曾虛白當初所料，在就任之初，他就積極地提出大規模改造計畫。改造開始後兩星期，他在中改會第七次會議上提出「確定本會重點主義的工作方案」，主張應該樹立理論基礎、確定重點主義的行動方案，以及發動墾荒運動為本年度中心工作。該方案的主要精神，是希望黨的改造工作集中於少數幾項事業，促進成效，用意在一新耳目，「以挽救群眾今日厭惡本黨的心理」。[90]方案中並對於墾荒運動做了具體規畫，包括土地取得方式、財務與專家來源，以及黨員與農民一起工作學習等等。該方案可看見一忠貞黨員努力思考黨的前途所提出來的計畫，亦可說是曾躋身決策圈後初試啼聲之作，可惜並未受到熱烈歡迎。根據對該案的決議，樹立理論基礎的部分另案處理，重點主義的行動部分則交主管組會商後再行討論，意謂「重點主義」的思考雖受認同，但曾虛白所提出的具體辦法未被接受。之後雖通過符合重點主義精神的「本會黨前急切工作要項」，但內容根本未提及理論基礎的研討與

---

[86] 中改會第30次會議記錄，《彙編》，頁29。

[87] 「本會當前急切工作要項」，中改會第10次會議記錄，《彙編》，頁10。

[88] 成員有張其昀、鄭彥棻、胡健中、曾虛白、郭澄、連震東、俞鴻鈞，由張其昀召集。中改會第6次會議記錄，《彙編》，頁4。

[89] 該審議小組召集人曾虛白，成員有崔書琴、谷鳳翔、沈昌煥及郭澄。中改會第21次會議記錄，《彙編》，頁21。

[90] 〈確立本會重點主義的工作方案案〉，中改會第7次會議記錄，《彙編》，頁7。

墾荒運動，曾虛白的努力不能說是成功。[91]

持平而言，這個案子相當符合改造的大方向，確實往後每年皆有年度中心工作的制度，黨的中心理論也成立小組多次研討。但是很顯然地，這個案子並非第四組的業務範圍。曾虛白事前是否有與其他組的主管相商不得而知，在甫成立兩週的改造委員會中提出改變整黨方向議案的確實是首見，可惜未獲青睞。曾虛白在第四組任內還未有太多建樹就離職，但他多次在自傳中提及此職位，或許表示他還有許多大計畫壯志未酬。在之後他所提出的媒體願景中，可以略見一二。

表二　曾虛白參與改造委員會任務小組一覽表

組織名稱	時間	《彙編》出處
「本黨中心理論基礎案」研議小組	1951.1.11	頁 99-100
對外宣傳問題改進研究小組(召集人)	1951.5.28	頁 179
闡揚主義工作小組(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前身)	1951.6.11-	頁 187
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	1951.7.30-	頁 223
「一年來本會工作及本黨改造案之執行檢討案」審查小組	1951.8.10	頁 233
「本黨四十一年度工作綱領草案」審查小組	1951.11.8	頁 293
「於美洲創立英文報案」研議小組	1952.1.23	頁 345
「加強中日文化合作政策草案」審查小組	1952.7.21	頁 465
「中央社企業化組織原則案」審查小組	1952.9.3	頁 500
「本黨當前新聞宣傳指導綱要草案」審查小組(新聞宣傳小組)	1952.9.4	頁 503

資料出處：整理自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

(七)中央社社長

中央通訊社是曾虛白任職最久的單位，對戰後台灣媒體環境的型塑影響深遠，在本文題旨的設定中，按理應該大書特書。可惜的是，中央社內部資料外人難窺堂奧，同仁部屬或門生故舊對於中央社時期的曾虛白，亦少具體詳細描述，使得此一工作面臨困難。不論是自傳或是中央社社史，對曾虛白在社長任內的事蹟著墨不多，反而較像是中央社整體的業務成果報告，例如重建海內外通訊處，拓展外語廣播服務，增建各式設備等等，曾社長個人的事功或影響性反而難以掌握。[92]就他自述，他每天下午到社第一件事即召開高級主管會談，令各人

[91] 「本會當前急切工作要項」，中改會第10次會議記錄，《彙編》，頁10。曾虛白對此並未忘懷，後在他將此方案發展為「發動黨員領導農業合作運動」，與之前發表於《中央日報》的〈黨義新詮〉與〈論黨的革新〉加以合併，成為〈革新芻議〉一文並加以出版。曾虛白，《革新芻議》(臺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51)，頁47-60。

[92]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858-590；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編)，《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　中央通訊社》(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頁70-72。

報告前一天主管單位業並提出問題，曾虛白則報告中央社應知曉的政府問題，並對主管們提出的報告和問題批示解決。每星期六再舉行全社各級主管參與的社務會議，進行一星期全社的總報告與總檢討，重點在於「工作的方向是否能與政府政策的運用密切配合，以求發揮中央社溝通管道最高的功能」，並對編採人員的工作成果評比獎勵。[93]

在其自傳中，描述較多的尚有爭取中央社同仁的待遇，使之與《中央日報》員工拉近齊平；設法使中央社員工參加公教人員保險；透過教育部購屋借予中央社，並得到中央銀行不需保證的全數特別貸款，將中央社搬進新大樓。[94]這些事情多半與中央社究竟屬於黨營還是國營有關，曾虛白另有專節對此事表達意見，由於這涉及曾虛白對於媒體與政府關係的定位，將於下節再述。

不過，有個事例卻是曾虛白運用中央社的力量，協助政府進行宣傳作戰，其運用手法倒是可以略見中央社在宣傳上的效用，此即「吳國楨案」。[95]1954 年吳國楨在離台赴美後，一開始尚未口出惡言，仍呼籲美國各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攻大陸事業，然而在台灣出現對他不利傳言，而他辯白未果的情況下，逐漸加強對政府的批判，而台灣方面也開始反擊。[96]

吳國楨在美批評台灣當局，立法院長張道藩提出質詢後，黨政各部門開始動員反制。除了「不法情事」的資料蒐集與法律解釋的研究之外，宣傳戰成為決勝的關鍵之一。為了齊一步驟，3 月 11 日由蔣介石指示每日下午五時半舉行「對外宣傳特別小組」，處理吳國楨案事務(第一次會議記錄寫為「吳國楨非法案處理小組會議」)，由黃少谷(行政院秘書長)擔任主席，商討吳國楨事件的宣傳布置與處理原則，曾虛白亦為該小組成員之一。[97]中央社於此事件角色吃重，包括指示中央社該發與不該發的新聞(不必發表吳國楨致國民大會函件全文、只可發國民大會主席團對呈函決議案全文)，何時該發(10 日發國大決議案，11 日發各報社論摘要)，以及採訪對象(訪問「本省知名人士」與非國民黨籍人士)。[98]事實上，中央社針對不同區域有不同的新聞稿，何時、何地發布什麼內容的消息，均由此小組決定次序節奏。[99]

曾虛白主張宣傳戰的步驟，不該與吳一來一往，適足以增加其曝光，而應提供資料加以辯駁。此主張獲得「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的接受，決議：「我今後新聞處理上仍宜鎮靜，擊中其害，不渲染，不宜造成吳國楨為頭條新聞的主角」。[100]但曾虛白並非消極對應，3 月 18 日建

---

93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12-614。

94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91-606。

95 還有另一個案例是對李宗仁進行宣傳戰，曾虛白提供資料作為各僑報指責李宗仁的依據，但此案較龐雜，故暫未處理。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542-546。

96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101-140。

97 〈吳國楨案〉，《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706.1/0005。

98 〈吳國楨非法案處理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吳國楨非法資料〉，《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706.1/0006。

99 〈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七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0 〈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議在並非政府未公布吳國楨「違法瀆職罪證」前，先行於媒體透露。[101]並且未了防止吳國楨利用僑報，提案要求以密電通知駐美各使館，以口頭方式轉達各僑報，不宜發表吳國楨投書媒體函件，此議獲得採納，並擴大至港澳地區報紙。[102]

其實在 3 月 16 日，蔣介石已指示不宜天天在新聞及宣傳上與吳扭打，但 18 日曾虛白仍想繼續加強攻擊力道，與他一開始的主張相違。[103]直到駐美大使顧維鈞(3 月 30 日)提出警告，[104]應邀至「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的俞國華(4 月 3 日)亦表示太多宣傳導致反效果後，才有上述提議用私下口頭方式封殺吳所發出的新聞。[105]事實證明，中央社處理新聞的方式成為吳國楨指控中華民國政府的依據之一，亦即中央社從宣傳作戰的輔助工具，轉而成為被攻擊的標靶之一。

中央社於吳國楨案上積極任事，除了執行上述小組決議事項外，充分發揮雙向傳遞訊息的功能，亦即一方面將美國政府、僑界及媒體報導以專電方式，發回台北作為參考訊息，另一方面按「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的指示，將反駁與指控吳國楨的資料拍發至外交部駐美各館，由使館代譯轉發僑報。中央社的作用，由吳國楨的抗議可見一斑。1954 年 3 月 20 日吳國楨致函紐約總領事館，指責「中央社從台灣向台灣報紙和華僑報發播對他有組織的『惡意宣傳』」，並要求中央社將其致總統蔣介石的信件發稿，若未果則將控告中央社毀損名譽，要求賠償二百萬美元。[106]26 日吳國楨再投書美僑界報紙，對何以中央社對其子被扣留為人質一事不正面否認提出質疑。而曾虛白也以中央社社長名義，發電文加以反駁，並敦促吳國楨回國至法庭辯白。[107]之後外交部通知駐美外館，只將中央社新聞發給黨報與同志所辦報刊，並以「本報專電」或「本報特訊」名義刊載，以避免相關法律問題(4 月 12 日)。[108]從吳國楨的激烈反應來看，中央社有組織且綿密的新聞發佈，確實產生了效果，成為吳國楨指控台灣方面打壓的具體對象。與剛從大陸撤退來台、中央社海內外機構凋零不全的光景相比，此時消息收發的管道、效率與力量已不可同日而語。

---

101 〈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九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2 〈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十六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3 〈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七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4 顧維鈞認為不斷進行宣傳攻勢，影響美國觀感。〈顧維鈞電文〉，〈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5 俞國華認為太多回應才使美國媒體注意此事。〈對外宣傳特別小組第十六次會議紀錄〉，〈吳國楨〉，《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805/0072。

106 〈中央社紐約廿二日專電〉，〈吳國楨案〉，《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706.1/0006。

107 〈中央社紐約廿九日專電〉，〈吳國楨案〉，《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706.1/0006。

108 〈吳國楨案〉，《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706.1/0006。

(八)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

任職中廣是曾虛白另一個重要宣傳工作，但如同在中央社，相關資料並未開放，很難追尋他的實際作為。他自述到中廣是因為董顯光的邀約，那時美國打算透過西方公司與中廣合作，對大陸進行心理作戰，派來的負責人甘露德(Rodney Gilbert)正好是兩人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與中國新聞學院的舊識，因此兩人才得到至中廣。[109]但實際上兩人到任中廣是 1949 年 11 月，當時大陸尚未全面敗退，美國對臺政策也還未確立，雙方合作進行心戰作戰至少也要到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之後，時間的落差牽涉到曾虛白何以到中廣的真正原因，可惜沒有相關佐證，自傳提供的訊息尚須再確認。

曾虛白在中廣設立「大陸廣播組」，負責編組與播送對大陸的節目，定名「自由中國之聲」，將新聞報導、台灣進步情形、廣播劇，以及他自己的國際評論節目「談天下事」等放進此節目。[110]此外，他強化戲劇節目的陣容，改進廣播劇的陣容技巧，設立文藝座談節目，約請專家研討等。

在中廣的經歷中，最特別的是他自己撰寫稿件、自己播報，長達二十年藉由廣播講述國際情勢的「談天下事」節目。曾虛白利用他身兼數職的豐沛資源，由中央通訊社取得國內外重要新聞，聞知黨政高層的意向，以此撰寫廣播稿，直接影響到他分析國際情勢的廣度與深度。該節目每星期日晚間七點，播送半小時，隔天於《新生報》第一版的專欄特稿刊載內容，再收錄於張其昀主持的《中國一週》，同時，也將廣播稿夾在中央社所發海外郵稿中寄送全世界僑報，使其無償轉載。[111]該節目從 1950 年 9 月延續至 1970 年 9 月共二十年，累積的廣播稿之後集結出版，名為《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下冊)、《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上、下冊)。從這些廣播稿來看，曾虛白忠誠地傳達了政府所欲台灣人民認識的國際觀，例如 1953 年韓戰告一段落時，他播講〈韓戰停火後應有的部署〉，主張朝鮮停戰並非戰爭真正的消除，應反攻大陸以徹底解決韓國問題。[112]在此之前，國民黨第四組發布宣傳通報，指示各黨政軍宣傳單位與媒體，應宣傳「惟有我反攻大陸，消滅匪幫，始足以解決韓國的問題」，宣傳上注意：所謂停戰，並非即是和平，亦非即是韓國問題解決之謂。美國應趁此時機……積極加強對華援助，使自由中國部隊更充實反攻大陸的力量，惟有如此停戰才有意義」。[113]在當時人民無法輕易出國，難以接觸外來資訊的情況下，曾虛白提供了一般人認識世界情勢的重要管道，也讓人在無形中接受宣傳體系所型塑的國際觀。

曾虛白在第四組主任的短暫期間內，曾批准中廣擴大電波設備的案子，由於他同時身兼

---

[109]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475。

[110]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482。

[111] 該節目的開始是星期六，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493；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776-777。

[112] 曾虛白，《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211-214。

[113] 「宣傳通報第25號」，《宣傳週報》，2:4(1953.7.24)，頁1-2。「宣傳通報第26號」，《宣傳週報》，2:5(1953.8)，頁5、13。

中廣副總經理，實際上有點像右手批給左手。觀其公文上批准的理由更覺有意思：「目前對外及對大陸宣傳，廣播實為最有效之利器，中國廣播公司設備方面，距理想之標準甚遠，所請改裝五十瓩廣播機，所需費用核係最低限度旰需，擬請交由黃秘書長少谷洽行政院有關部份酌辦具報」。[114]曾虛白在自傳中所強調身兼四職一事，其實這些職位在倫理上彼此有所衝突，上述案例清楚地顯示他以上級身分，核可自己主管業務部門所提案子，顯然有球員兼裁判之嫌。由於曾虛白擔任中廣副總經理是在接第四組主任之前，又是副職，或許還稍可視為過渡之舉，然而當他成為黨營媒體主管的中央社社長後，11 天後即辭職離開第四組，前述的倫理衝突也告結束。從他後來的發展來看，曾虛白在人事安排中從此被定位為媒體經營者，而非宣傳行政的主管，離決策核心再也無法如此靠近(曾虛白其他工作職位請見表三)。

五、對新聞宣傳工作的理念

曾虛白來臺後歷任重要宣傳部門的職位，致力協助國民黨政府於臺灣重新站起，宣揚政府德政，並打擊危險意見，一直到晚年為止，他未曾改變其立場。支撐他這麼必然有其理念，曾虛白也不吝於講述他對新聞事業的看法，在各式場合大聲疾呼。身為中央社社長，其發言本就動見觀瞻，加上他同時兼任重要新聞同業團體的領袖，又是政大新聞系所的創辦人，演講論述場合眾多，使得後人得以從豐富的文本理解他的想法。從這些文字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曾虛白的理念體系具有高度的完成性，核心價值清晰而確定。值得注意的是，曾虛白的發言多針對新聞記者或大眾傳播業，很少以宣傳人員為論述中心，不過由他的理念、自身的認知與實踐來看，他對於新聞業的期待，其實與宣傳的意涵相去不遠。

(九)後知後覺者的社會責任

曾虛白對於宣傳工作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認識，來自於孫文提出的「三覺論」。孫文在討論政治原理時將人分為三類，亦即「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仿傚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又認為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鼓吹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115]先知先覺為少數天才，後知後覺者受到先知先覺啟發後，鼓吹大部分不知不覺的群眾，整個國家在「先知覺後知，後知覺不知」的架構中「竭力樂成」，才能運作順暢。怎麼讓不知不覺的人懂得先知先覺的主張，並且心悅誠服地盡一己之力完成該主張，就是後知後覺者的任務。這三者並非固定階級，經由教養，不知不覺者也可以進化為後知後覺或先知先覺。[116]

---

[114] 〈張道藩董顯光呈蔣中正中國廣播公司五十瓩短波廣播機已裝成待員額經費核定後即可正式供用〉，〈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九年 （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2-049，入藏登錄號：002000001731A。

[115] 曾虛白，《民意原理》(臺北：華岡出版，1979)，頁267。

[116] 曾虛白，〈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新聞制度理論〉，《新聞學研究》，9(臺北，1972.5)，頁4。

此種人群分類構成了曾虛白對於政治制度、宣傳工作與新聞自由的最基本看法。社會原理既經國父分析透徹，國家危難或維持安定都可從此概念中推演而出，因此在曾虛白自認獲得高層垂青的重要文章〈革新芻議〉中，他引用此架構，主張革新時期的國民黨須召募的新黨員應為可領導不知不覺的群體，因而對象應為知識份子。[117]在論及政治制度時，認為奠基於「多數統治」的西方民主原理無法避免「多數獨裁」的缺失，只有三民主義所強調的「竭力樂成」，讓不知不覺的廣大群眾樂於接受領導，惟此才能符合全民利益，補救西方民主制度的缺憾。[118]他也引用孫文的另一個比喻，即將人民比為三國時期的劉阿斗，執政者則為諸葛亮，「劉阿斗是一個無知的娃娃，可是他當權，必需有明智的抉擇。如何使無知的娃娃能作明智的抉擇，就得靠諸葛亮智珠在握的善為說服他了」。[119]

至於是由誰來補救民主制度缺憾，在曾虛白的論理中，正是新聞記者(或大眾傳播業者)來承擔。曾虛白分析，雖然孫文與蔣介石對於新聞記者究竟是先知先覺還是後知後覺略有出入，但他認為根據民意學的研究，一國政治的運作，是先由私人提出「意見」，透過民意的共鳴而成為「建議」，最後經採納才成「政策」，新聞記者最大的功能「只限於貢獻研究成果以輔助先知先覺者瞭解真相，作正確的研判以資規定明知合理的政策」，因此，新聞記者只能是後知後覺者。[120]溝通上下，將所學所得貢獻給上位者，成為曾虛白對於新聞從業人員與新聞事業的最重要定位，至於監督政府或是新聞自由，對他而言並非第一要義，甚至有害。

換言之，新聞記者的最重要任務既然是提供上位者作決策時的參考，又要使民眾對於政策「竭力樂成」，那麼新聞工作就不該是純粹贏利，而是應該顧全國家安全與發展。曾虛白因而型塑「中國記者」應有的樣貌，訴求以全民利益從事新聞行業，有別於西方記者唯利是圖，販賣新聞為業。[121]傳播事業應加強自律，壓制賺錢的動機，增加社會服務的目的：[122]

> 一定要傳播事業盡了它社會服務責任之後，它才有享受這份新聞自由神聖人權的權利。因此，反過來說，假定傳播事業不能督責自己，作有效的自律，政府不應坐視其毒害社會，不加干涉，最後，制定法律，限制新聞自由泛濫的流毒，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
> 這是我們政府反攻以前在自由中國新聞政策應取的態度。

因而他反對將「新聞自由」標舉為最高價值，因為一味學習西方而無視濫用新聞自由造成的流弊，對於中國並不適合，何況處於反共戰爭時期。他也引述西方學界研究，為「社會責任」高於「新聞自由」尋找理論依據，[123]並且參與多個新聞團體的成立，實踐他所謂的「新

---

117 曾虛白，《革新芻議》，頁21-22。

118 曾虛白，〈愧對二聖——一個從事新聞教育者的自檢〉，《由衷的傾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76-78。

119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736。

120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頁763；曾虛白，《民意原理》，頁240-246。

121 曾虛白，〈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新聞制度〉，《廣播雜誌》，326(臺北，1972.9)，頁4。

122 曾虛白，〈傳播事業的發展與政府應有的決策〉，《光復大陸》，48(臺北，1970.12)，頁33-35。

123 曾虛白，〈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新聞學研究》，1(臺北，1967.5)，頁7-29；曾虛白，〈我們要有自己的

聞自律」(見表三)。

持平而言，曾虛白從美國的例子反對媒體商業化操作的想法，在深受媒體品質惡化所苦的現今台灣來看，確實令人心有戚戚焉。亦有學者指出曾虛白在提出社會責任論的同時，也強調以新聞自律避免政府介入。[124]然而，回到時代脈絡，在商業化未泛濫的階段講求新聞自律，並成立新聞黨部貫徹黨意，其實際的效果是架構橋樑，將當權者力量引入媒體。這些理念與作法，皆源自於他對新聞記者的定位，即後知後覺者應該為先知先覺者提供服務，而不是質疑批判。

最後可以從曾虛白的一件事，為後知後覺者的自我認知與應有的表現作了很好的示範。前面提到，當他擔任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時，幾乎天天與蔣介石碰面，除了該開的會之外，蔣還就國際問題時常垂詢。他自述之所以能夠對國際問題侃侃而談，是因為得力於美國的剪報服務(clipping service)，以及自己對於各類議題的分類整理。藉由訂購有關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剪報，上述服務系統將美國國內外英文報紙相關的報導評論彙整送達後，曾虛白再以何事、何人、何地、何時、為何、如何六大類加以歸檔，因而一有問題可立刻查檔得知。曾氏認為他憑此檔案取得蔣的信任，「使我變成他隨時要找的顧問。可是，我能供給的祇是客觀的資訊，這資訊一經　蔣公融化後變成他的判斷，這判斷的淵深與高超，經常使我折服得五體投地」。[125]但凡在無數的資訊中過撿選整理部分所需，已帶有自己的立場眼光，還要回答涉及因果解釋的「為何」，必須融入主觀的判斷，曾虛白長期在廣播節目中評論國內外大事，即是靠此所得。對於自認終生為新聞記者的曾虛白而言，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一個理想的後知後覺者，其專業、其分際，以及身為後知後覺者的自豪，而這自然也是他對新聞媒體包括宣傳工作者所期待的角色。

由此對照曾虛白的宣傳工作，不論是其來台初期計畫進行的情報調查，以及中央社長年蒐集海外報刊訊息，以重要參訊的方式專門提供政府高層判斷輿情之用，或是藉廣播節目，配合宣傳命令，將黨的國際認識傳達給一般聽眾，這些工作都充分地實踐了後知後覺者溝通上下的使命。曾虛白不僅參與創建了戰後台灣的媒體環境，也定義了新聞事業應有的角色。

表三　曾虛白任職其他新聞機構一覽表

	職務名稱	任期
1	教育部廣播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2-
2	政大新聞所所長	1955-1967

新聞政策〉，《民意原理》，頁356-358。

[124] 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頁228。該論文詳述曾虛白如何篩選、引進與轉化外國理論，形成自己的「新聞自由」概念，見該論文頁229-235。

[125] 底線為筆者所加。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頁873。

3	中華民國通訊事業協會理事長	1963-
4	新聞黨部主任委員	1965-
5	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第二至七、十屆理事長	1951-1956、1959
6	中國新聞學會主任委員	1966-1972
7	電視學會電視節目研究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2

資料出處：

1：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頁776。

2：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33、38。第一年兼系主任。

3：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36。

4：楊秀菁，〈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頁3。詳見註6。

5：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下集，頁775；「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網站」，網址：http://betablog.udn.com/0901TJA/6547658 讀取時間：2013.6.2。

6：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37、41。

7：陳新萌，〈曾虛白先生年譜〉，頁41。

(十)將黨與公劃上等號

既然新聞媒體被定位於後知後覺者，那麼什麼樣的環境才能使這個角色好好發揮呢？即使曾虛白是環境的創造者之一，但他對現況並不滿意。他在 1972 年自中央通訊社退休，辭去中國新聞學會主委，行政工作告一段落，此時前後他回顧台灣媒體環境，陸續發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新聞制度〉(1972)及〈我們要有自己的新聞政策〉(1973)，提出他的理想境界。在他名為「三民主義新聞政策」的圖像中，媒體若要盡到溝通上下的功能，最理想應為國營，以使領導者能有效掌握。然而在未達到此目標前，應將媒體的營業部門與業務部門(編輯採訪)完全區隔，營業部門由政府或企業投資，業務部門的記者則進行訓練考試，並由具聲望的「合法傳播專家」主持，依政府所訂傳播政策、服務單位所訂傳播規範，以及同業間簽定的傳播公約處理業務，不受營業部門干擾，如此，才不致使新聞受到營業部門的干擾。[126]

雖然曾虛白未用「公器」一詞來形容媒體，但媒體存在的目的在於為全民利益服務，應儘量排除商業利益的考量，確實接近「公器」的概念。曾虛白對於「公」的概念有時與「國」相互混用，例如上述媒體國營的主張有時會用公營表示，但他對於「公營」的概念描述最清楚的案例，來自於對中央社的定位。中央社究竟是黨營或是國營，長年使主事者困擾。中央社由國民黨成立，改造後隸屬於管理黨營企業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自然屬於黨營。然而這在成立之初的訓政時期並不成問題，因為當時的政治體制為以黨領政，黨營企業由政府編列預算自屬合法，此情形到憲政時期就出現衝突，黨營與國營必須加以區分。當時部分宣傳部門成為政府機關，如原屬黨的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成為行政院新聞局，中央社則維持黨營，然而經費龐大，非黨能負擔，遂由教育部將中央社所需經費掛在教育部的預

[126] 曾虛白，〈我們要有自己的新聞政策〉，《民意原理》，頁363。該文原刊於《東方雜誌》，7:3(臺北，1973.9)，頁10-14。

算裡，再由教育部轉撥。曾虛白對此模糊定位深表不平，他憤慨地表示：[127]

> 我們可以攤開中央社累積的社稿來檢討，會有一條新聞不是為利國福民而發的嗎？我們切切實實做了最忠實的公務員，可是，我們的經費永遠要掩掩藏藏掛在別人下「偷」到手……更何況我和同茲兄主管中央社時期黨政一家，為國盡忠到為黨服務，更沒有作這種掩耳盜鈴令人不齒醜態之必要。

可見得曾虛白認為一個完全為國家做事、為黨為國同時盡忠的媒體，應該予以國營化。如前所述，社長時期的曾虛白爭取中央社員工參加公務人員保險，他認為當時的銓敘部有意無意地承認了中央社是一個國營機關。而當時美國財政部對於中央社是黨營(民間團體員工在美要課所得稅)還是政府機構(國營機構員工不必繳所得稅)亦有質疑，曾虛白同樣努力將中央社推向國營的方向。[128]

基於上述理由，曾虛白曾於改造委員會當中向當局力爭，卻遭黨內元老的反對。他如此反駁：[129]

> 他們仍以為中央社是在廣州時期由本黨一手創建的宣傳機構，自應保持此具偉大影響力的事業為己有，劃歸國營，將來政治發展趨向多黨模式，國民黨不執政，中央社不能再為黨服務，這犧牲就大了。這套話，好像言之成理，實際仍是強辯，可是我就在這強辯的壓力之下失敗了！

曾虛白未對「強辯」多做解釋，但他顯然認為中央社為國做事理應為國營之事實，高於堅持黨營以避免被他黨所用之疑慮。此種不囿於一黨之私，主張執行公務即應脫離黨營的想法，是曾虛白對中央社的基本定位。

不過到了 1988 年，政治環境丕變，曾虛白的態度有了巨大的轉變。當時反對黨對於非國營機構卻由政府預算支持大加批評，主管機關考慮將中央社改為國營，以使合法。此發展原應符合曾虛白長期以來的期待，但他卻表示如果此時改為國營又犯了錯誤，其理由是：[130]

> 中國國民黨一黨執政時，黨政一體，中央社改為國營，我們能保證本黨天下為公的黨性，不會影響中央社的作業而使其變質；但，現在轉型為多黨政制，一旦他黨執了政，難說中央社不被利用而變了質。因此，中央社國營祇是國民黨一黨執政時的權宜之計，今轉型為多黨政制，中央社應另籌確保其純潔統治管道的辦法。

曾虛白此時所持理由與當初改造委員會當中的反對意見，非常一致。兩相對照，其態度之所以轉變，實因國營的基礎在於國民黨的一黨執政；認為反對者「強辯」，實因他判斷當時環境談多黨政制還太過遙遠。不囿於一黨之私，實因只有一黨可執政。

曾虛白因而提出在國民黨無法一黨執政時期中央社應有的定位，既不應黨營也不該國

---

[127]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0。
[128]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598-599。
[129]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0。
[130] 底線為筆者所加。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7。

營，而是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為模範的公營。他首先再次基於「三覺論」，反對在黨營與國營之外，朝向民營贏利的方向，因為以賺錢為目的民營化並不符合三民主義的民主體制，而應使其成為獨立的社會事業。他進一步解釋公營的方式，在於立法規定由政府預算支持中央社，但政府無權干預運作，以確保其「不受政治污染」。[131]按理，此種公營的概念避免了政黨輪替的影響，即使出發點是為了確保中央社不被他黨所利用，但亦可從媒體獨立運作的角度加以肯定。不過，曾虛白很快地想到了一個例外的情形，那就是將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返回大陸的時候。因為：[132]

> 大陸赤化將近半世紀……根本不知道自由民主以及一切做人應知的常識。我們回大陸面對的最重要問題是如何實施我們全民族的再教育……中央社應是最優先考慮的一個機構……那時候，公營的中央社在其 BBC 型式作業之外，又要執行教育任務了。這或是一個過渡性的變質，在這特殊任務完成之後，仍將恢復其純潔傳播管道的本質。

這意味著前述政府無權干遇的公營模式，在遇到國家需要時，仍舊要負擔政府的「教育任務」。曾虛白以「過渡性的變質」與「恢復其純潔傳播管道的本質」來描述返回大陸時期的中央社，也表示他了解這其實違反了他所主張公營的「獨立性」。

從中央社的例子，或許可以此個案試著整理曾虛白對於媒體「公器」的理念。首先，「公器」既是為國家服務，因此不該走向營利，這自然是基於「三覺論」對於新聞媒體的定位，從他對新聞媒體的理想境界來看，可以清楚了解他對於媒體商業化的疑慮。其次，這個「公」既非純由排除商業壓力的角度出發，亦非全然欲將媒體獨立於政府干涉，而是由國民黨「天下為公」的建黨原則加以論理。在他的概念中，因為國民黨是抱持著「天下為公」而成立，所做所為是以國家利益而非一黨之私，因此國民黨執政時自然是「黨政一體」，為黨服務同時就是為國服務，將國民黨成立的媒體改為國營，使用政府預算，並無任何不妥。然而，一但政府有可能由他黨執政，他對於能否確保國營媒體「不被污染」並無信心。[133]這意味著，只有國民黨執政時，媒體國營也不必擔心政府介入，為黨與為國並不衝突，沒有標舉媒體獨立的必要。至於其他政黨執政時，才應立法以「公營」的概念排除政府干預。但即便法律已確保了媒體的獨立性，一但反攻大陸，國家需要，「公營」媒體仍須負責政府交付任務。

整體而言，曾虛白的「公營」與BBC的「公營」，其理念基礎完全不同，若受限於所用的字詞與所舉的例子，容易忽略了論理的脈絡。簡單來說，曾虛白媒體「公器」的理念，奠基於「黨等於公」的基礎上，而這個黨，自然是指中國國民黨。[134]他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以及對黨的忠誠，連帶影響了他對於其他政黨與言論空間的態度。此一立場，一直到其晚年，越發

---

131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8-609。

132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9-610。

133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中集，頁609-650。

134 學者指出曾虛白本身的認同樣態與「國府霸權體系」合而為一，鞏固且創造了霸權。邱家宜，〈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頁186-187。

堅定。[135]

六、結論

本文藉由考察曾虛白來臺後從事的宣傳工作與理念，希望以此觀察國民黨於臺灣重頭做起時，宣傳部門如何重建布置的部分過程。1950 年代初期曾虛白擔任數個重要宣傳職位，可說是宣傳體系與媒體環境的鞏固者與創建者，在中央社與中廣的案例中，可看到他個人的努力痕跡，也可知隨著時間累積，整個宣傳體系的力量已逐步壯大，不僅對內改進宣傳內容，也可對外進行宣傳攻勢。

來臺後宣傳體系重建最大的特色與重心，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嚴密指揮體系。從決策、執行到業務部門，從人事更迭到政策方向，蔣介石的意志被極度彰顯。即使並非盡如他意，但與大陸時期相比，蔣的權威無人可以挑戰，此點符合整體黨的改造精神。蔣對宣傳事務的高度興趣，以及自身秘書系統亦承擔宣傳事務，使得與蔣的關係親近與否，成為宣傳官僚能否預聞機要、更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曾虛白並非出身侍從，與蔣關係亦非密切，加上在黨內未有派系奧援，雖然與陳誠熟識，卻和準備接班的蔣經國未顯熱絡，這或許是在圍繞著領導中心的宣傳體系中未能更上層樓的背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不論哪一時間，皆充分展現對黨的忠誠。藉由國史館檔案，本文發現曾虛白在 1949 年初來臺後，很可能與老長官董顯光從事情報調查工作。在計畫書中，曾虛白不居職位，服務於直屬於當時已下野的蔣介石，在臺灣進行訪查，以了解陳誠治下的臺灣對於政府施政的態度。宣傳與調查如同新聞的採訪與編輯，曾虛白在大陸時期也曾協助董顯光撰擬情報組織計畫，對情報工作早有淵源，而日後他擔任中央社社長時，亦充分發揮情蒐與宣傳的技巧。這段時期在曾虛白的自傳中是空白的，更加添從事秘密工作的印象。

曾虛白擔任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時間非常短暫，僅兩個多月，但他努力地扮演忠貞黨員幹部的角色，積極擘劃改造工作。由於身為第四組主任，讓他兼任宣傳會談的秘書，使其得以在此總統主持的會議中，了解高層意向、參與政府決策，並展現自己在掌握國內外新聞的專業，以供高層判斷。他還需要為重要文告擬定宣傳計畫，整頓黨營媒體，協助將黨的核心概念與領袖意旨下達於基層。曾虛白於改造委員會開始沒多久，提出規模宏大的改造計畫，牽涉廣泛，事權超過第四組許多，未獲黨內青睞。由於時間過短，曾虛白還未有太大建樹就離開，但從他多次於自傳中提及此職位來看，或許其離開時還有許多遠大的計畫未及實施，其理想或可從其之後提出的願景中，略見一二。

曾虛白另一個重要的職位是中央通訊社社長，他在此職位超過十年，之後轉任管理委員

---

[135] 曾虛白於八十九歲發表〈愧對二聖——一個從事新聞教育者的自檢〉(1983年)，自我檢討未能盡到後知後覺者的責任，愧對國父與蔣公；九十一歲時，撰寫〈由衷的傾訴〉(1985年)一文，愛黨護黨之心溢於言表，還受總統蔣經國致函嘉勉。見曾虛白，〈由衷的傾訴〉、〈愧對二聖——一個從事新聞教育者的自檢〉，《由衷的傾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3-10、75-81。

會主委，在中央社工作超過二十年，對戰後臺灣媒體環境的型塑影響深遠。可惜相關檔案未能開放，無法一睹其詳細的工作內容。但從他參與「對外宣傳特別小組」因應「吳國楨案」一事，可以看到他如何運用中央社資源，發布或圍堵消息，以利政府宣傳。在此案例中，曾虛白雖一開始力持穩重，但綿密的宣傳攻勢逼得吳國楨將矛頭轉向中央社，要求該社平等對待新聞來源，不應只發不利於他的消息，使得中央社從協助政府宣傳的工具轉為被反擊的對象。此案例除了凸顯曾虛白的積極表現，更重要的是對照剛從大陸撤退、中央社海內外機構設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來臺五年後中央社消息收發的管道、效率與力量已不可同日而語。曾虛白任職中廣副總經理也是重要宣傳工作，且其主要負責的節目是對大陸的心理作戰，理應大書特書，可惜同樣受到史料限制，本文無法詳盡考察。在僅見的資料裡，其自編自播長達二十年的國際情勢節目「談天下事」，忠誠地遵守宣傳命令，協助當局塑造一般人民的國際觀。

在支持曾虛白從事宣傳工作的理念上，以後知後覺者的社會責任，以及國民黨治下的媒體「公器」最為重要。曾虛白以孫文學說為基礎，認為人群依智力分為三等，其次序與任務應為「先知覺後知，後知覺不知」，先知先覺為少數天才菁英，後知後覺者受到先知先覺啟發後，鼓吹大部分不知不覺的群眾。新聞記者便是後知後覺者，承擔起下情上達、說服民眾接受政府施政的任務，換言之，如何使民眾「竭力樂成」，是新聞事業存在的目的。因而「新聞自由」與贏利考量不是記者的第一要義，顧及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社會責任」才是最重要的任務，並以「新聞自律」要求自身不可偏離軌道。曾虛白反對媒體商業化操作，強調自律以避免政府介入，確實有其道理，但回到時代脈絡，在商業化未泛濫的階段講求新聞自律，成立新聞黨部貫徹黨意，其實際效果是架構橋樑，將當權者力量引入媒體。後知後覺者的專業與分際，曾虛白自身的實踐可謂作了完美的演繹。

至於國民黨治下的媒體「公器」，則展現了曾虛白對新聞事業的願景，讓吾人得以了解其心目中最重要的信念。即使作為媒體環境創造者之一，曾虛白對於戰後臺灣的大眾傳播仍不滿意，他認為最好的環境是所有媒體國營，以完成後知後覺者的任務，避免商業利益的干擾，但在達成此目標前，應對所有記者進行考試訓練，並獨立於營業部門。從對中央社的定位可知，曾虛白反對將媒體掌握在黨的手中，對於為國家服務的媒體主張國營，但到了解嚴後有政黨輪替的可能時，他馬上轉變立場，反對國營，因為只有以「天下為公」創黨的國民黨執政時，國營的媒體才得以保持純潔地位。他除了表達對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不信任外，他還提出「公營」的概念，即政府編列預算支持，但立法不可干涉媒體，以確保中央社不被其他力量誤用。除了前述排除媒體商業化的主張外，此「公營」概念進一步排除政府介入媒體，即便出發點是擔心其他政黨濫用媒體資源，仍究確保了媒體的獨立性。然而，曾虛白認為，當反攻復國後，大陸同胞亟需再教育，在此過渡期裡中央社應負擔此任務，這表示所謂媒體的獨立性其實不復存在。曾虛白媒體「公器」的理念，奠基於「黨等於公」的基礎上，而這個黨，自然是指中國國民黨。

從曾虛白來臺後所從事的工作來看，他鞏固宣傳管道與創建宣傳組織，在日常工作與特

殊事件時發揮力量，為在臺重建宣傳體系奉獻心力。他的理念與工作合而為一，對於後知後覺者的專業與分際，演繹得自然且自信，代表了國民黨改造時期的精神，就其始終如一的表現而言，他是成功的。不過，他努力尋找西方理論，透過篩選、翻譯與轉化，試圖印證孫文學說的高瞻遠矚，終究還是無法擺脫「新聞自由」的困擾，其所訂定的「三民主義新聞政策」未能實現，不論從學術觀點或實際操作來看，他是失敗的。有個小插曲或可做為總結，曾虛白在政大新聞所時，曾為了營救教師朱傳譽而走訪情治首長，並與其他新聞界大老去函警備總部，終究徒勞，只能搖頭嘆息。[136]在那一刻，身為後知後覺者的他，該如何使民眾對政府作為「竭力樂成」，或許在理念與實踐上，都是個難題。

[136] 朱立，〈曾虛白：新聞教育的領航者〉，《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Ⅳ》(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9)，頁38-39。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17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計畫主持人: 林果顯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55- 學門領域: 台灣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果顯	計畫編號：101-2410-H-004-155-
計畫名稱：1950 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為中心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1	100%	篇	〈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TSSCI)(2013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審查，待刊中)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 年 6 月 8 日。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林果顯，〈以後知後覺領導不知不覺：來台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20 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研討會」，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主辦，2013 年 6 月 8 日。（研討會論文、2013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國史館館刊》審查，待刊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別於體制面，側重於人的作用，試圖為戰後台灣的宣傳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簡言之，從個別宣傳人員詳細的個人生命經歷著手，為國際觀形塑的背後因素提供基礎性的研究，初步成果在研討會發表，並投稿通過學術期刊審查，已達成原先計畫所設定的目標。

在學術價值和主要發現上，本計畫成果應可作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本計畫在學術意義上具有延續性。戰後台灣人國際觀的塑造，一直是尚未全面性而完整考察的議題，本計畫在之前《宣傳週報》對宣傳命令的疏理，及《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的比較研究基礎上，放進人的因素，使此議題的討論更為完備。透過觀察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李士英等四人對於國際觀的特殊觀點，尋找個人因素在整體官方國際觀宣傳中的影響。這四人雖然資料多寡不一，但在共同點上，四人所關切的焦點仍然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美蘇兩大強權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政」，以及自由與共產集團的角力。由於這四人皆曾執掌黨政宣傳管道的重要位置，因而他們的言論與政府態度亦步亦趨，根本立場並無不同。

唯本於個人學養經歷，以及與層峰關係及所處位置，這四人的國際觀仍有差距。曾虛白長期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所獲資訊以美國剪報服務最為重要，雖亦旁涉「匪情」研究單位的報告，但立論較與美國親近。陶希聖來台後雖未必擔任主管，但地位崇隆，重要外

交事件及國際情勢研判場合皆可見其身影，其國際觀更加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為主體，在政府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阮毅成與李士英的角色更接近技術官僚，忠誠傳達黨意，阮毅成離開《中央日報》後除了在香港《自由人》半月刊投稿介紹台臺灣政情，少有公開評論國際局勢文字，李士英則成為《中央日報》內的國際問題專家，關注焦點以蘇聯為主。在特定的關鍵時刻，不同的背景使得不同的人浮出檯面，得以理解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背後，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其次，本研究尚有開創性。這些人物其實尚有公私資料有待更進一步的開拓整理，其餘宣傳人士的國際觀也還有待分析。人的因素在黨的指揮下，雖然被盡力抹平，但若能在關鍵的特定事件，整合各類檔案，勾勒出更為鮮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皆為未來研究發展的可能性。此議題適合繼續深入擴大，發表於期刊上，與其他學者進行交流。